

書叢活生書讀

續 主 標 卷 號

活 生 何 如

—— 第一卷 第一冊 ——

作 混 柳

行 印 社 版 出 活 生 書 讀

如 何 生 活

—— 讀 書 問 答 第 一 集 ——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

著 者 柳 湜

出版者

上海靜安寺路
讀書生活出版社

經售處

斜橋弄七一號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四日出版

本書的特點（代序）

李公樸

我愛讀本書作者寫的文章，因為他不是文章家，他的文章是在說他要說的話，所以明白易解，不帶任何方巾氣味，讀起來，平淡自然，雖不在賣弄學問，但理論的深厚自然可見；雖是紙上的文章，却因與實淺融成了一片，只見熱情奔放，這是本書作者的文章的特點。

至於「讀書問答」呢？那更是他的文章中最可讀的一部份。「讀書問答」開始在申報發表，每日有文章一段，本書作者就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許多人都愛讀過，用不着在這裏贅述。

本書內的文字，却是讀書生活第一二卷上發表過的選集。全書計十七篇。這些文章都是按照讀者的來信，選擇有一般性質的，先經過編輯部同人的討論，凡是關於實際生

活的問題，就歸本書作者主撰。所以這本小冊子的特性，就是集中在討論生活，雖然討論的範圍有個人的，有民族的，有實際生活的處理的，有徧於意識形態的；總之，是以認識生活爲中心，要達到理論去指導生活，改善生活的目的。

這十幾篇文章，有幾篇文章是曾經轟動過一時的。如「不能跟阮玲玉走」的那一篇，曾經引起了廣大的注意，我們收到的來信就不少。那確是一篇對於認識阮玲玉自殺這一社會現象寫得最深刻動人的文字。「青年病」，那一篇在我看原稿時，就很受感動，覺得要這樣誠懇的態度，那麼熱情，同時認識又正確，是不容易的，要這樣方足以指示青年。果然，人同此心，讀者寫信來告訴我們，說讀了這篇文章感動得流淚的就不少。其次如「怎樣認識人」，「做事的態度」，二篇像這樣科學的指導處世的文章，我敢說，是很不容易見的。

「如何生活」，「小雀子要認識世界了」，「人和環境」諸篇，我都高興讀，都是值得介紹的文章，以外的許多篇涉及的範圍較大，有的關於民族出路，有的認識的方法，有的

論及中學生的生活，都是深刻有力的作品。不過，就我個人說，我總覺得題材越小，寫得越細緻，就越動人，可愛。凡是說大道理，談學問，就對人有些肅然的感覺，雖然我同樣看重這些篇文章，可是我最愛的到是前面舉出的那許多篇，也許作者的最長處，還是在寫小題材的方面罷！

我與本書作者共事已兩年多，素來是沒有客氣的，以前我對他的文章，常常表示不滿，覺得寫得太生硬，歐化，也常常替他改稿，引起過小小爭議的事，也是有的。可是兩年來，他一天天的作風在改變，通俗與流暢的程度，我們可以在他先後寫的文章中看出來，到現在，我感覺到像他那樣熱情，那樣細緻，淺明的文字，在現在是很少的。這大概是因為他兩年來，不斷的與上萬的讀者層的接觸的結果罷！「讀書問答」在讀書生活中是被人認作最滿意的一欄，果爾，我要謝謝本書作者，同時並把這本小冊子介紹在沒有讀過這些文章的人的面前。

目錄

序

- 1 如何生活..... 一
- 2 青年病..... 一〇
- 3 小雀子要認識世界了..... 二〇
- 4 怎樣認識人..... 三二
- 5 做事的態度..... 四三
- 6 不能跟阮玲玉走..... 五五
- 7 論所謂「桃色慘案」..... 六八
- 8 人和環境..... 七六

- 9 論現在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八六
- 10 葉青先生的方法論……………九四
- 11 李權時所處理的實際問題……………一〇七
- 12 阿Q的精神勝利……………一二一
- 13 七分經濟三分文化嗎？……………一三二
- 14 投河殉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四二
- 15 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一五二
- 16 我們並不忘記在校學生的讀書與生活……………一六三
- 17 中學生對於過重的功課應取的態度……………一七六

如何生活？

——答燒餅迷，蕭強君等——

最近有許多朋友對讀書生活提出了一些批評，關於生活方面的，我們可以拿這位署名燒餅迷的及蕭強二君爲代表。燒餅迷說：「我沒有見到讀書生活上有生活的介紹；我沒有見到讀書生活上有生活的指導；我只見到一些讀書與生活的記述，訴苦，甚至於誇耀，最後他希望我們將「所提幾點，提出討論」；「能爲介紹工作，可請代爲謀一維持生活之位置」。蕭強君則因生活無法維持，又不肯做自己不願做的「生活」，覺得人生甚無興趣，但同時又「無勇氣去自殺」。蕭君說「我怎麼辦呢」？讀書生活上並未給他解決的方法。他要我們給他明確的答覆。

以外，我們還常常接到有些更不幸的朋友，在預備自殺前寫給我們帶血的信。這一

概可以歸併到「如何生活」這一問題裏去。

燒餅迷君對本刊的批評，在原則上，我們應接受，因為讀書生活共出了九期，對於活鮮鮮的生活指示似乎是太少了點。但是，燒餅迷君對於本刊的認識，卻完全與我們兩樣，卻不可不為之辨別清楚。讀書生活對於生活的指導不是極狹義的介紹職業，解決某一個人的生活；是就更廣大更一般的認識生活，確立正當的生活態度。我們指導的方法，不是從自己的荷包內拿出幾個洋鈔，或代為找一個職業，而是指示一些生活的邏輯，即一方面指示讀者從讀書去認識生活，一方面從生活中去展開認識。所謂生活指導，即在引導大家一面學習生活的知識，一面如何去從事生活奮鬥，所謂「生活的介紹」，我們當然只能做到目前「生活記錄」的限度，使各種不同職業生活的人，多認識一點生活相，不能是介紹職業。因為目前中國社會的困苦，大家感着生活難，因此「生活記錄」中，不覺好像是「訴苦」，沒有笑嘻嘻的面相。但我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何必要裝作苦笑說快樂呢？這一點，與某報說我們要把這些店員學徒，喊出店舖，犯了同一的

錯誤。

所以，「讀書生活」四字不能分開來了解。專門了解上面「讀書」兩字，或者專門注意下面「生活」兩字，都是不夠的。整個的說，無論是讀書或生活都是爲的了解生活，加強生活奮鬥的能力與毅力。

不能做到介紹職業，讀書生活中的生活指導就真的沒有實際的意義了嗎？不見得罷！像蕭君及許多其他朋友的來信中所提出的問題，仍然很重要。這些在燒餅迷君的眼中看來，好像是太空洞了，但是這些問題的重要，恐怕要比解決一個個人的飯碗還要來得大些。因此，本刊對於生活指導，決不會因不能解決某幾個人的飯碗就認爲是空談，無意義。恰恰相反，我們覺得要做得應該比燒餅迷君所希望的大一點，因爲對於這些窮朋友個人的幫忙，雖然，千萬的應該，可是個人的力量終是有限，你能滿足幾個人呢？即令對於少數人一時的失業解決了，但是，是否這一問題真的解決了呢？真的解決得了呢？這種態度對於大家生活的認識是否就算正當呢？

我們以為這完全是實用主義對於生活看法，不能說是最合理的。

書歸正傳罷！現在要來同蕭君討論「我怎麼辦呢」了。按來信，蕭君是中產家庭破落下的青年，學歷是畢業過中等學校了。以前的生活是完全依靠父母，對於世事是從來不大關心的，到了現在，家庭不能維持了，不得不將大家庭分開，兄嫂歸兄嫂，母親回娘家，小妹妹跟姨母去，自己呢，是帶着老婆「不知怎樣辦」。但是蕭君真的就沒有生路了麼？不！他說，「有些生活我不想幹，如家庭教師，店舖管賬之類」，「有些生活我幹不來，如要吹牛拍馬的差使」；「挺而走險，我又受道德，法律，身體等限制不能幹」。這裏的幾條路中，至少家庭教師，管賬這條路也還是蕭君的生路。為什麼蕭君不能幹呢？蕭君告訴我們，他最怕同閩人和商人見面，他還說：「放下自己十一歲的小妹妹不教，忍心把她送到姨母家去過「大姐」一樣的生活，自己去教人家的少爺小姐，心裏怎能放得下」！他又說，「父親在世時，自己開了許多大店，現在都歸了人家了，反去向他們要飯吃，你說死臉不死臉」？這就是蕭君不想幹的理由。

是的，蕭君對於自己這種生活態度，也自知是死路。他還想活，所以他並未絕望，他告訴了我們，這一兩年來他讀的社會科學書已不少，他總覺得書上說的總不過是書，對於他的生活，很少裨益，就是看了「六七期的讀書生活以後」，也依然得不到「解決的方法」。

蕭君，我們對你萬分同情，因為像你這種生之苦悶的人，現在真不知有多少，但可惜的是你一兩年的讀書，並不能轉移你那根深蒂固的小所有者的生活態度。你不能把書中指示你的一些認識，拿來去分析你的過去生活，去分析你為什麼這樣悲哀，這般頹廢，去找求你的將來。家產蕩盡了，豈能盡「歸長兄不善治理」？一個人是否一定非有家產就不能過活？你那般的自尊誇大，那般鄙棄他人，那般的不肯屈尊去鼓起生之奮鬥的雄心，這一切，你知道是根據什麼呢？有了這些否定生之要素存在，蕭君！蕭君！你對人世對自己就不能不都是灰色的了。你不能不顯得是一個「孤獨者」，你不能不與人世隔開了。

蕭君！我們不是要來指摘你個人，而是要追尋你的這種生活態度的根據，告訴你在這種態度下生活，不獨是悲哀，並且絕沒有生路的。

我們萬分誠摯的告訴你，這一副灰色眼鏡是你那小所有的「家庭」傳給你的，你現在要趕快連同那破落的家產一起去丟到爪哇國去。過去的安樂，不要留戀，目前的痛苦不要徒作悲哀了。你應更進一步的去吸取新鮮的生活要素，增強自己生活奮鬥的毅力。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你這一二年來的讀書，是沒有收到讀書的益處的。因為它沒有變化你的「意識」。仍使你安然於這種個人主義的破落的小所有的氣氛裏，度你那「無可如何」的歲月。你現在應該怎樣丟掉這件「長衫」呢：

一方面是要從觀念方面下手。就是你應認明目前中國的社會，你要把小所有的破落在時代上去求解釋；不，不僅如此，連整個的你的思想和氣氛，都要找出社會的根據，再從社會着眼，去謀個人的出路。這樣一來，你對於今日的「世態炎涼」，就不會只帶破落貴族的悲憤，一點無反抗和忍受的力量。關人「擺起那一種牛肉面孔」，「商人那狡猾眼

「瞎」，你何必害怕！你認清了社會的出路，認清了個人的出路應與它相一致，於是你確定下你的人生態度了。那末，至於個人的私生活，我想，只要不違背你的生活主張，你所認爲的生活意義，不鬼混，不偷安，不苟且，你爲了小我的存在，有什麼事不可做，有家庭教師，管賬的機會你爲什麼不想！現在一面教中學生，自己的兒子進不起中學的事有的是，你何必那樣女子般軟弱，動不動就想起自己的妹子來了。人家的勢派管我鳥事！至於父親手下的店內去管賬，這事在今日歐美許多中等資本家破產後，在以前是自已的經理，現在是大資本家的廠內當經理相同，在外國有的是，「十年興敗幾多人」，算得什麼！以外，在什麼機關供差使，甚至於販報，當夫役都有什麼侮辱？你看見過「桃李劫」沒有呢？平日很用功的大學生，結果也不得不賣氣力過活。時至今日，什麼身份的臭架子還要它何用？

蕭君，脫下你的長衫或混身在一羣醜態人羣中並與你無什麼羞愧，不潔，最怕的是自己醜態了，或者自己一無目的，對於人生是無興趣，只是「得過且過」的慢性的自殺。

你有了生活的目的，對於個人的私生活委屈一點，又值得什麼！

倘若你有了以上的認識，投身生活奮鬥，即令就個人說，你會沒有生路嗎？是的！首先你要活，要養活自己同老婆。我為你設想，你自然不能同社會孤立起來，你不能不保持過去的一切社會關係，同時還得展開你的社會關係，降低生活標準，抱什麼事都幹的主張，一有機會，即不放過。有了事做後，能養活老婆自然更好，否則，也可以使老婆去做事，一時找不到事也可以暫時將她送到娘家去住幾時，你慢慢的去想方法，使你們最低限度生活費用有着。在做事中，不必怨天怨地，你應咬着牙關幹去，去嘗人世上的甜酸苦辣。

這裏，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你在這種生活狂潮中打一個滾，不被惡浪打擊，沉淪下去，你要有生活奮鬥的知識，這知識一方面可由書本上來，一方面要到苦難的實生活中去磨鍊。有些人以為在目前談讀書是迂闊，只有到實生活中去，這與專讀書不願實踐一同陷於形式的，機械的看法。須知無認識，無意義的生活是受難，曾經不起打擊，

專讀書也只會變爲書癡子。所以讀書生活的創刊，我們要與大家交通的，不僅像今日這樣正面的談「如何生活」方是生活的指示，即平日談「意志自由不自由」及什麼問題等又何嘗不是生活的教育呢！

總之：像蕭君這類的人現在正不知有多少。我們覺得與這同類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本欄以後希望多登載一些血鮮鮮的生活討論，不陷入離生活太遠的理論的探討。想來在目前的客觀上還是很需要的。以後的讀書生活，除去各欄多充實生活記錄，認識的啓示外，就將本欄公開的作爲將「認識」用到實生活中去，及從實生活中提出的問題的討論罷！

青年病

——答邱玉銘，何楚，余桂山君——

最近我們接到三封在實生活奮鬥中敗北者的來信。他們都是十分有爲的青年，他們都對於所遭遇的失敗，並不灰心，他們一樣的虛心，想探討出他們失敗的根源來。因此來信都寫的十分誠懇，詳盡，並都對自己作了嚴肅的自我批評。

有兩位還是學生。他們這次撞的禍，是關於文字的。因「文字不慎都被學校開除了」。其中的一位，是邱玉銘君。他在校刊上發表了一篇批評學校的文字，題目叫做「同學爲什麼對於時事的不注意？」是針對着教務主任在前一期上發表的「怎樣引起同學對時事的注意」而寫的。里面因爲宣露了一點學校的醜惡，用了「帝國主義」以及「我們要做人，要認識真理」等詞句，而被認做搗亂，無理的被校學開除了。

另一位是何楚君，她是一位女性，在高中唸書。因為她的私人的信件被學校訓育主任拆看，向學校提出質問，學校對她早生了仇視。最近因為她參加反對禁止男女同學運動，反對蓄髮運動等被學校查出，並拏了他在學級壁報上的文字作理由，宣佈開除學籍。

這兩樁公案。性質是差不多的，所以先擺在一起。

另外一封信是余桂山君等七個人合寫的。他們是一家大染坊的店友。內裏有作坊工人，學徒，站櫃台的「先生」，跑街的等等。他們被開除的緣因是這樣的：

近因：是店內緊縮，店中減少工錢百分之二十，並在櫃台上裁減店友，總店分店共二十人之多，均代用「練習生」，他們這七個人，聚在澡堂子內商量對付的辦法，被一位同事報告了，於是激起經理大怒，將他們當夜逐出店門。

遠因：是，他們「平日愛讀書，尤其是新的文學和社會科學書，讀了，口裏也喜歡說幾句」，「新名詞是常常在口頭上滑來滑去的」。同時「對於同事，凡是怕事的，一概看

他們不起」，他們七個人，「有人目爲七大金剛之名」，所以經理早就懷恨在心，過了這一個機會就先下手了。

這是第三樁公案的事實和經過的大路。邱君在失敗後，他說：「這不是什麼新鮮事兒，我一點也不詫異，也不怨恨任何個人，我只想從這痛苦的經驗中學得些什麼」。他對自我的批評，是「淺薄，深切感到自己在各方面都欠充實」。「不曾認識學校當局和學生間的對立嚴肅」，「我沒有任何防備，無準備」，「我對當局的心估計得太寬」，「我沒有看見我以外還有全體同學」。

何君自己也感覺，「鋒芒太露」，「有了事一點不能忍耐」，「自己的思想不能沉潛隱藏」，「愛罵人」。

余君等七人的缺項，在遠因中也大概的說過了。

總括一句說：他們的行爲都十分可愛，都還有一些毛病。這毛病是什麼呢？大概就是所謂青年病罷！如果站在教育者的見地看來，除開應該隨時熱忱的加以指正外，是不

能加以深責的：這種病症不是危害生理的惡疾，而是青春期中，短速時期中的微恙，祇要善爲指導，這種微恙的經歷反可以助長他將來的生長，達到壯健的前途去。我們現在接受這幾位朋友的要求，來在這裏討論，雖然好像是他們的私事，實則我們是不認爲這是私事的。

如果分開來考察，先就邱君說，我們對於邱君那篇文章（感謝邱君將雙方的文章寄給我們）在原則上，除開非常表示敬佩外，實在找不出他有罪過。他是在說真話，句句都是真話。那位教務主任如果真的要「怎樣引起同學對時事的注意」，讀了邱君這篇文章，將如何受到感動呢！然而，那篇文章在形式上，確實有毛病，就是過於「心直口快」，在這樣的年頭，目前的環境，是有妨礙的。如果那位教務主任，站在教育者的立場，應該將邱君叫到教務室裏，諄諄的解釋，這種青年的直爽，將會妨害自己的前途，要他以後的發言，行事，一方面固然不要屈服黑暗，掩蓋真實，歪曲真理，但同時不能不顧到實際，不能不顧到客觀上許可實現我們理想的限度；尤其在詞句方面，應該教給

他，少用不需要的新名詞，新術語，免得無謂的惹出口舌。這一來，方可說不失人師的態度。那位先生，不能出此，誠然是一件憾事。

至於文責問題呢；我以為這應由校刊編者負責，不能歸罪作者；並且校刊的性質與普通刊物不同，是偏對內部的，即令發出一篇失檢的文字，最大限度掉換一位編者儘夠了，再追究作者負責，實在可以不必。

我們在這裏不想對學校當局多說話了。我們要詳說的是查出邱君在這次「失敗」中的主觀上的缺點。可惜我讀了邱君供給我的全部材料後，實在除開都是青年一般容易犯的毛病外，找不出它的特別症疾。

何君給我們研究的材料很少，壁報上的文字也沒有方法看見，不知到底說了些什麼。至於何君的行動，我們能有什麼異議呢？個人的私信是不應外人拆閱的，她向學校質問，能說沒有理由麼？反對禁止男女同學和蓄髮，我們也覺得完全是何君的個人的自由，學校無理由于干涉到這種合法的行動。現在問題就在何君在壁報上發表的文字一項

了。如果所說的話不是大謊謬的，我覺得何君在一般上是無罪過的。假若是因為她平日「喜歡說話」，「做事」，「罵人」而即加以罪名，那還是教育的目的麼？不過，在何君方面，我們也感覺何君自己指出的幾項，就是青年一般的病症。我們對於何君也尋不出這共通病以外的別疾。

至於余君等，也完全與以上邱何二君一樣，我們認為都是無過錯的，難道爲了自己的生存起而掙扎的行爲也是過錯麼？不過，余君指出的遠因，那到確是自己的缺項，是青年一般的病症。

現在我們要作一總的進言了。我們萬分寄與充分的同情於邱，何，余君等。我們對於你們的行爲雖然在原則上都認作無過，但不能否認你們在奮鬥上是失敗了。不能否認你們的奮鬥，在認識方面，技術方面還有欠缺。朋友！我們已經說過，我們並不認爲失敗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我們並珍貴這種經驗，並且這也是青年走到成年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我們難道還要青年都要「少年老成」起來，大家來做馴服的綿羊麼？不！

但是，現實是太殘酷了。青年現在所遭受的殘害，如果我們有正確的統計數字記載出來是會令人顫慄的。卽就你們九個人說罷，不能說不是過於重大的處分了罷！

我萬分心平氣和的告訴諸位，也極希望諸君虛心坦懷來聽我的話。這種青年病，如果說得不客氣一點，也可說是幼稚病，在今日青年要作成人用的時代我們不能不特別指出，希望大家自爲醫治。

青年急進勇爲，無所顧忌的精神是可敬佩的。但有時主觀太強，不肯細心去觀察現實。我常常看見好多青年，他們對於世界的大體的輪廓容易抽象的把握，但不能具體的看見這個世界；對於改造的理論容易無條件的接受，但對於實行的方法未免機械的運用；對於理想中的堂皇的輪廓含着微笑，但對於現實的醜惡不敢正視；對於理想的實行過於急情，但對於實踐中的環子不能抓着。他們容易把實踐所經過的灣曲險阻的道路，看成康莊的直道；他們容易把改造事業看成傳奇的英雄的故事；他們容易過於信賴一切的人都是英雄，也同時容易否認周圍一切的人，看不起他們，自己變爲孤獨者。他們富

干理想，同時也容易幻滅。

由此，我們自己來反省自己一下，自己祇要能百分之百的虛心，我們怎能否認這些不是缺點呢？

所以，我常碰見社會科學還只讀過概論之類的人，竟是新名詞滿口，開口這樣閉口那樣，對於國內的實際情形，完全不聞不問，祇是到處的玩弄詞句，隨便就亂開口，參加各種討論，敢於亂下結論。這無疑是容易惹起人家的不快的。

對於人，也喜下機械的論斷，因為自己學得的抽象的理論，沒有通過中國的實踐的，不僅不能認識事，也同時不能認識人，只看見別人的外表，有時對人作過度的恭維，有時則作不適當的攻擊。團結不到朋友，打擊不了仇敵。

至於在生活奮鬥中，姑無論對事對人，均不能有正確的估計，那是不足怪的。他們太把一般擴大了，忘了一般中的特殊；他們太把抽象的理論擴大了，忘了抽象到具體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因為熱情超過理智，蠻幹超過認識，弄得對於每一件事，在原則上

都可同情，在行事上都不敢領教，弄得「成事不能，敗事有餘」，「仇者所快，親者所痛」，這種現象，我真不知道經過多少。

雖然，以上這些幼稚病，不見得邱何，余君等都有的。但是你們既然不恥下問到我，我也老實說，你們多少是有一些關係的，你們自己也是承認的。

我們要知道，做今日的中國人難，做青年更難，譬如就邱何二君說，本來還是學生時代，就理講，學校內那裏還會有什麼對立呢？徧徧中國有。對於師長那裏還要防備呢？徧徧不見得。學校本來要自己改進，使學生進步的，學校本來要提倡學生課外活動，參加學校生活，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而在中國徧徧要學生自己來掙取，來進行死活的爭，這些為光明的孩子，因為處世不深，某些方面沒有看到，於是就被殘酷的虐待，或作時代的犧牲。本來，在這一時期顯出些孩子氣是沒有什麼的，但時代的嚴肅，不許可你了。至於余君等，雖然是進到本來更嚴肅的生存競爭的場面，但在其他國度，這種集會也是為法律所許可的，可是在中國則不然，中國的老闆是超法律制裁的。所以，在

行爲方面，偶一不到處，就供了犧牲。

總之：我要對一切青年朋友作最後的進言，我們以後要極力避免以上的幼稚病。這要怎樣獲得呢？一是，不怕碰釘子，釘子碰得越多，只要都能像這次一樣不灰心，又虛心，那是供你的經驗不少的；二是，多讀書，加深你的認識的工具；三是，少開口，慎開口，把一切要做的事放在心上，腳踏實地的去做，不要先掛在嘴裏；四是，把自己的思想藏在你的腦裏，不要太露鋒芒；五是，不要把自己弄得與社會分離孤立，要接近你的朋友，和可作朋友的一切人，也不必怕你的敵人。總之，把以上總括起來，你在行動前應正確的認識環境，和自己的力量，不能像賭博一樣，孤注一擲，一個中國現代青年，他要負起成人的職責，所以他要趕快去掉本來不足責的孩子們的氣習。

然而，這樣平凡的話也明明還是客觀上需要的，請青年朋友們勿笑這是老生常談罷！

小雀子要認識世界了

——答周方君——

「連日報紙上登載的兩樁全家自殺的消息，想來因此而引起內心不安的人，不祇我一個傻子罷！我的妻子爲了這不關己的新聞哭過兩次了。第一次是不知不覺的流淚，至於放聲大哭；第二次是避開我一個人偷偷的在揮淚。我也流過眼淚，心更是冷冷的。先生，不要笑話罷！我肯定說這決不能用淺薄的一點同情心；或是什麼婦人心軟的緣故來解釋它的。

我們在這兩件慘劇中，明明看出了我們自己的命運。不是的麼？岳張兩悲劇的主人不都是屬於小所有社會階層中的人麼？張家原來還是相當富有的，岳家呢？以前一月收入也有過一百多元。並且也曾有過一些積蓄的，他們在以前都能過着較平安的生活，誰能

夢想到自己的末路會如此。啊啊！他們到了不得不自殺了，並且把自己的孩子們一同殘殺了。

這不是明明白白在諷刺我們，暗示我們的命運麼？

我顫慄了！我的妻子顫慄了！哭了！傷心的哭了！但是在這一時的情感退落後，我的妻子就對我說：『寰！你今後脾氣更要放好一點，不能失業呢！你要想到我們也是有三個孩子的人了。在我呢，自然更省儉，下月一定就不用娘姨了，我想以後要有一點儲蓄，不到萬不得已時，不拏用，我盡力幫助你，不使你過於爲家庭操心，好不好！不過，你也不能不時時刻刻記着家庭，你是有妻子和三個孩子的父親呢！』

我聽了她的話，我不能說出什麼。因爲我找不出比她說的更有理由的反駁，我看着搖籃內臥着的孩子，在地下玩着的孩子，在燈下溫書的孩子，我能不忠謹的接受妻的善言麼？

但是，我在另一場面中又會遇到另一個與妻的看法完全相反的人，那是我的同事張

胖子。他聽了我告訴他上面的心思後，不覺大笑起來，他帶着嘲笑的口吻，向我道：

「你真是婆婆媽媽的，你未免在『杞人憂天』了。在這樣的時勢，有了今日，你還能肯定有明朝麼？得過且過罷！一切都要『媽媽虎虎』，何必這樣認真呢？人生是求快樂的，能快樂一天，就是一天，不要快樂中去想愁苦事，一切就快樂。哈哈！節儉，連娘姨都不用省幾個錢存到銀行去罷！中國人開的銀行倒了好多家，外國人開的也一樣倒了啊？辛辛苦苦儲蓄的幾個錢，送到那裏去，那才不值得呢！並且，現在的金融方面變動得太厲害，我們都是生意場中人，難道還不明白嗎？今朝你存在銀行裏明明是一千元，你能保明朝不變為五百嗎？哈哈！老弟！你還是不要想心事，『得快樂時且快樂』！」

「啊啊，還有：嫂嫂要你的脾氣放好一些，如果對於嫂嫂個人自然應該遵命才對。假若說脾氣好，就不會失業，那也完全是說謊。失業不失業，現在連『本事』都不能決定的，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也一樣要被老闆攆出門，因為老闆生意要關門，你有『本事』，你對人和氣，那有什麼用處？所以，像我們這類小雀子，餓死就餓死，能吃得飽

一點，就不要想心思，還是窮開心的唱它一隻歌罷！

啊啊！先生！這一番話不也是十分真實的話麼？他不是把我那妻子的好夢轟得粉碎了麼？

是的，朋友中，也有生活過得很嚴肅，不抱張胖子這種態度的人，同時對於家庭也不像我這樣的擔心。我是被許多朋友認為最無用，或者最可憐，最自私的人罷！

先生！我陷在這種矛盾中生活着，我不能自主了。我已明明白白看見自己的前途可危，但又沒有自救的辦法。果然，我們就只有聽天由命嗎？不！我不能學張胖子的樂觀，我學不來，我又不能過其他朋友理智而又嚴肅的生活，能忍心的捨家不顧，同時又不能安於這種不生不死，不餓不飽，生活在這狹小的家庭之內，並且這種苟安，明明也知道不允許我能保得住的。

這怎樣辦呢？想來世間上像我這類無用的人還多着啊！不知先生們能給我詳細的解釋否？」

——周兆——

我們在十二分的感動中，讀完了周君這通來信。我們極端希望，讀書生活上能討論到這樣實際的問題。這裏，又使我們想到另有一位朋友的來信了。他對於本刊的「生活紀錄」雖然相當的表示贊成，却認爲非常的不夠，就是光止記述了生活的各種形態，並沒有加以生活的指示。這個意思，在後一意義上是對的。所以本欄能遇到周君提出的這類新鮮的問題來，就可以補足這不足，這不是就兩全了麼？

言歸正傳罷！

周君這封來信，我想，對於本刊的讀者是會特別引起關心的，因爲這裏觸到的問題，大致都與自己有關的。本刊在目下到底也還是我們這些「小雀子」讀物罷！因此周君的心情，苦惱，矛盾，也大致常在我們自己的腦中旋轉，我們對於周君的每一句話，也是覺得熟習，容易體會的。

我敢於說，陷於周君這樣矛盾生活的人，在我們這些「小雀子」中，是要佔着大多數

的。「小雀子」的生活基礎，現在不獨動搖了，並且趨於片片的瓦解，於是，在舊的生活基礎上所建立的生活方式，都不能不隨之變化，連我們的思想，氣氛也變得自己有時也莫名其妙土地堂，這是一點不足怪的。

周君！所謂「小雀子」的生活基礎是什麼呢？用一個比喻說，它本來就是一堆不高不低，不能安定的土壤，它不能變成高山，同時也暫時不是幽谷。但是地震是不能免的，只要這社會的地震一動搖，陷落為深谷的機會總要多，能高長為高山的總是少的。在你們生意場中又有幾個爬上老闆，經理的地位，而不是「忙到老，飢不飽」的呢？這種生活基礎，一向是造成了對於個人生活的特別關心，小氣，弄小心眼，徘徊，自大，傲岸等氣質，在平常的時候，「小雀子」慣會唱太平歌，也裝着高貴的鳥兒一樣，在那兒做黃金夢，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小雀子。等到自己的生活基礎不安定了，這時，他們有最敏的感覺，接受這實踐給與他們的刺激，但是，他們對於這五花八門的現象，因為處處以個人利害的打算不易認明它的真實，只是覺得他們有着兩面性。個人生活在事實上是不能太

顧慮了，但又不能放棄已過慣的小康生活，浪漫的氣氛是不對的，但自己又理智不起來。爲了民族而犧牲自己的人覺得可敬，但自己却不能照他一樣。

卽擎周君對於岳張兩自殺案說罷！這種刺激很快的使周君及他的夫人看到了自己的命運，這種非常的敏感不是偶然的。

周君夫人那一段話，真正可以代表一切小所有階層的女性，所謂能體會時難的「賢妻良母」的心理。自然，我們無理由去責備她，但從她的話中，可以看出在這沒落中可悲的消極的掙扎。她想用馴服節儉去挽回時代的命運。可惜，她的幻夢竟經不起張胖子的一擊就粉碎了。

現在再看張胖子罷。張胖子的話，實在有些是真理。他的透澈世情比周君高。但是，因爲他仍是在個人主義的觀念內兜圈子，所以他雖能看出「小雀子」真正的命運，却不能跳出「如來」的法掌，他估量估量自己小小翅膀的力量後，覺得一點也沒有辦法，好了，沒有辦法就沒有辦法好了。管她娘的，得過一日是一日的主義就誕生了。「餓死就餓

死，能吃得飽一點，就不要想心思」或者「還唱一隻歌」，這種樂天並不是真正的樂天，只是哭裏帶笑，絕望中的自欺罷了。說一句真心話，張胖子的話又何嘗不帶幾分傷感！是的，無論是周夫人的消極的掙扎也好，張胖子的樂天自欺也好，都是無補於自救的。

周君呢，在面對他的賢妻稚子前，他不能不接受他妻的善言，可是他內心又明明知道這苟安也仍然是幻夢，張胖子的話雖然有些真理，但他又不能聽從，在這兩種生活態度之外，周君說，他還有生活嚴肅的朋友，但他的理智又辦不到。這怎麼辦呢？在孤另另的周君，自然是也一樣沒辦法，所以周君對岳張兩自殺事件也祇有陪着夫人流淚，傷心，哭自己的命運。

真的就沒有辦法麼？

不！決不！辦法是有的，那就是要把眼睛突過個人看得更遠一點，你應把你個人，家庭的生活放在更大的生活鬥爭中去解決。單單把一己的生活作爲孤立的解決是沒有解

決的可能的。這首先要你放棄你過去抱着的個人主義狹隘的觀念，以及一切徘徊，多疑，等氣質。傷感是沒用的，絕望的樂天，也同樣是一種自殺。你應對爬上高枝的幻想絕望，你應不求苟安，你應該過着理智而又嚴肅的生活，不慣罷！你應學習，這就是放棄「小雀子」的生活圈，而另求你的新生活。

這要求你換一個新的人生觀。

這裏我不是要你就脫離家庭，捨棄妻子，叫你到關外去抗戰，去作民族鬥爭的英雄，固然，能夠這樣做的人，我們自然也萬分敬意，寬恕他對妻子的忍心，但這不能希求於每一個人的，並且，在一般生活指引中，也不應是這樣機械的，公式的唱高調，我們覺得最主要的指示是一般的平凡的生活形態，不應強調那特殊的生活型。

「小雀子」現在先要認識世界，認識人生，認識當前的一切現象，以及民族和世界發展的前途。渺小的個人，不過是這大潮流中一隻螞蟻。你應參加這偉大的爭取大眾生存的前提條件的陣營中去，是的，你可以不站在最前綫，但你不能離開這整個的陣綫，至

少你的個人生活要配合這一時代的客觀的實踐。

你有了這一點認識，不把個人問題過於誇大，你就會換了一種眼光，不會看無論什麼是懷疑，傷感；你會理智的考察一切。譬如，就你個人生活而論罷！家庭生活弄的簡單，所謂「節儉」雖不能挽回「小雀子」沒落的命運，但你要能夠吃得住在這時代轉變辰光的客觀的殘酷，奮鬥過程中的艱辛，你就不能不早日把自己那種脆弱的身體，不習體力的勞動等習慣，加一番鍛鍊。我們敢說，凡能打過這時代的難關的人，一定是能吃得痛苦勇於奮鬥的人。不用娘姨，自己操作，這一意味上我是同意尊夫人的主張的。

至於講到儲蓄，（我不知道你是否真有儲蓄），我覺別有一點意見。我們以為你與其省得連書報都不看，到不如把省下來的錢，多買點書報看看，我們認為你和家庭目前需要儲蓄的還不是幾個錢，而是時代的知識。窮不打緊。你再窮，失業了，只要你不擺「小雀子」的身份，什麼體力勞動，「下賤的」生活都可以幹的，問題祇在你認識多少。人生目標確定後，你會小視個人些許享樂，你會看不起它，你會欣然接受一切苦難。至於

甚或在奮鬥中也要餓死，窮死，你也會在另一種心情中安然閉眼的。你不會再傷感了。我敢於說最近岳張兩自殺事件，我們對於岳張二家不能不表示遺恨。因為他們的行為，雖然是社會造成的，社會要負重要責任，但是他們的主觀方面就可說不負責任麼？不能的。他們的死明明是不能放棄舊日的生活架子，才覺得無路可走了，並且不想自己，子女降落到低級人羣中去，索性由自己的手殘酷的殺死罷！這一來，雖然同歸於盡了，但的確維持了那「不上不下」的「可尊貴的體面」。周君！這一悲劇的最慘痛處，就是在此，能值得我們警惕的也就在此。

總之，你應看清你的命運，不是一己的，真的這種飢餓和不幸降臨到你的家庭來了的時候，也不必過於傷感，更不必懼怕它。俗話一句言，萬事到了頭上，裝傻裝軟也是沒有用的。我們只有挺身而起去抗戰一切困難，我們才能求得生存。

是的，在今日要吃得住這痛苦才能獲得生存，今日中國的環境，比岳張兩家更苦的人，不是正多着麼？他們爲什麼不自殺呢？這是因爲他們生活的意識不同，他們能吃

苦，但不是無條件的作牛馬的馴服，他們並不滿足這牛馬生活，他們在這牛馬生活中，明明看出前途有的還是光明，不過這光明是要由自己去爭取才能到手的。他們沉潛的在努力，爲了自己，爲了兒孫，爲了大眾，至於個人眼前一點痛苦能值得什麼呢？

周君！我們對於這兩齣悲劇，不應傷感，應如何來自勉呢！

怎樣認識人

——答郭宜齋君——

「世界是不易認識的，其實人也是同樣不易認識。人之心各如其面，我到覺得還不足以形容，我的經驗告訴我：人的祕密有時會超過你的意料以外，我平日最爲尊敬的人，祇要一日我們相處一塊，不幾天就會覺得平凡了。甚至心中現出鄙視的心思來。因此，我對人就根本起了懷疑了。

我覺得奇怪：對於世界的啓示，認識的方法，書上常是讀到，並且用起來，也無不驗應，但是對於人的認識，我們好像只能憑自己的一點經驗，書上說的『待人接物』，『觀其言行』，我看都是廢話，我們拿來應用，是不見靈效的。難道真的是『人心不可測』麼？」

這一段話，是郭君來信中的最末一段。像這樣提到人的認識問題的，我們也常常碰

到，祇沒有把它單獨當做一個問題解釋過。現在有了郭君提出的這一個機會，我們到要和郭君及其有同感的朋友們大家來談一談這東西到底應該如何去認識罷！是的，宇宙的現象是繁雜得很，巧的是認識的方法只有一個，郭君對於書上指示認識世界的方法，不懷疑，而對於人的認識則覺得有些兩樣，這也許還是郭君對於認識法還沒有十分到工的地方罷！

郭君！首先我告訴你，「人心並非不可測」，人也並不是不可認識的。人，不要把他神祕化了，人雖視作「萬物之靈」，其實他仍不過是萬物之一，宇宙中的一個構成的分子。宇宙能想法子認識，這一小塊碎片難道還不可認識麼？

對於宇宙，我們反對那「不可知」論者，我們對於宇宙的認識是一天天在擴大了。至於人，其容易認清他是不能與宇宙成比例。但是人還覺得奇怪的，只不過沒有獲得認識他的正確的方法罷了。我們更要反對人的「不可知」論啊！

郭君懷疑的基礎，據上一段話說，我們看出郭君說話的攏統，沒有把這一個問題說

得清楚，並且在郭君的眼光內，還帶有不少的世俗的成見，這成見無疑的還在障礙郭君透視一切呢！

這怎樣說呢？下面就要詳細解釋了。現在首先應提出對於人的看法的幾個層次來，以後再好一層一層的談到中心的認識上去。

我們要知道：人是宇宙的一分子，是生物的一員，是屬於動物這一類的，所以在分析一個人的生活時，不要忘了「人」，無論「聖賢」，總都帶有這動物屬性的許多性質。這是第一點。

第二，人是生長在社會中的，他的思想，行爲，習慣，嗜好，以及各種生活形態，都要受他所處的那社會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所規定，限制。所以要了解一個人，譬如一個中國現在的人，你的朋友，你不能僅從他本人身上，從頭到腳去找他的好處與錯處。你不要把他當作孤立的東西來秤量他的輕重，你應把他放在社會內，今日中國眼前的社會內來秤量。離開了社會的意義，可以說就沒有個人的斤兩了。

因此，在認識個人前，你應：

先對宇宙有過大量的認識；

對當時的社會有較深的認識，把這作前提。

再去檢查這社會的一分子的他，在這一時間這一地域的言行。或者就整個說，他的生活，是否是有價值的，或沒有價值的。對於古人的估量，就要顧到當時的一切，要這樣才不會在枝枝節節的方面，同情他這樣，反對他那樣，其實都是未着邊際，未觸到癢處。

把以上這一點粗淺的原則了解了後，我們再來回顧郭君說的「我平日最爲尊敬的人，祇要一日我們相處一塊，不幾天，我就覺得平凡了」的話，有什麼毛病，毛病在什麼地方。

這毛病自然在說得不明白，不具體，但也還能表達出一部份意思。這正合中國有一句老話，就是「英雄日見亦常人」的意思。平常人，對於一個在言論界能說幾句公正話

的人，在文壇上能出一部傑作的人，在講堂上能解釋一種深奧的學問的人，在政治上能領導某一行動的人，總容易給與過度的恭維和尊敬。世間上的人，因為聽了某人一篇演說流下淚來的事很多；讀了他一本小說，自己就對這位作者發生了戀愛情緒的少女也不少；對公正的輿論因而「五體投地」的更比比皆是；對政治家發狂喊萬歲的事，也是人的常情。但是，他的這樣狂熱，也許會使這些「英雄」們的左右的人，太太，秘書，打字生，茶房覺得稀奇古怪。為什麼這些癡子要對我的丈夫，主人這樣敬意呢？他不是天下第一個好吃的大王，終年都不洗澡的怪人麼？他雖然寫出了一部好小說，但你真的以為他是八小時工作的，勤勤懇懇在寫嗎？真是天曉得，他的懶是古今不二無雙的，他那本書就是在許多大醉後隨便寫出的。

熟知這些先生們的私生活的人，自然是太太和僱用人及少數親密的朋友，他們看慣了這些先生們的公私的生活覺得平常得很，並不見得在台上受人喝采的人，一定是天天洗澡，整潔，一天做十四小時的工，不喝酒，或者簡直是獨身主義者，不僅獨身，連對

女人或男人想也不想的聖人。因爲不如此，所以覺得不稀奇，因爲也和自己並沒有差異，所以覺得人家捧場的好笑。

至於台下的人呢？因爲聽演講入迷了，把他當作了超人，於是忘了他還是人，有人必有的一切屬性，連動物性的性生活也毫不缺少，胃比別人大，要多吃一些東西，也是不能免的。所以，一旦這些台下人，聽見這位先生的茶房說，他是吃的大王，懶的混君時，自然就不免吐出舌頭，大爲驚異。平日與他在什麼事上不快意的人，就把這作爲人身攻擊的理由，宣佈你十大罪狀，這一切在今日人的秤量中，常常就作爲秤的法碼。

這是公正的麼？不！這完全是不公正的。我們對於一個人的評價，不應把他的私生活方面擴大得太過火，我們要問他的行爲的社會價值。同時我們不應把他作爲抽象的超人，應把他當作是有血有肉的人，你需要的物質的慾求，他也同時需要的。

舉例來說罷！譬如節儉艱苦，我們在私生活上原是奉爲「金科玉律」的。我們常常同情某人布衣蔬食，剃光頭，着布襪，不坐黃包車，每日步行五十里，不看梅蘭芳，每夜

讀書八小時等等「嘉行」，但是，這就可以作為其人的秤量上的法碼麼？

不能的。因為我們要問這節儉，艱苦與他的行為的結果是否有社會價值。譬如他完全爲了守財，那節儉，艱苦與社會有何好處？不看梅蘭芳，如果每晚讀八小時「太上感應篇」不是比看梅蘭芳還無益麼？世人拿節儉艱苦來賣弄人，來估名釣譽就多得很，他們想在這些小節上，博人同情，要別人忘記他在社會上造的罪惡，這本是不壞的「嘉行」，這時反成了惡人的工具，欺騙的法碼。我們常常看見，自己刮了五六千萬的頭皮，殺了好多萬老百姓以後，於是身上換老布大衫，手裏拿佛珠，滿口阿彌陀佛，或者開辦一兩個善堂，施幾瓶沙藥，救濟水，你就可以說他是一個好人嗎？

自然，我們並不反對觀察一個人，不要忘了私生活，我們更不會反對節儉，艱苦這些「嘉行」。但我們只把它與這人的行為的社會意義合起來看。譬如這一個人是一個爲大眾利益的政治家，他的言論，行為處處是爲公的，但是他爲了工作，不得不坐汽車，不得不有一身禮服，不得不每天多吃一兩塊帶肉的麵包，不得不有一個祕書，一個「勤

「務」，早上有時不得不睡到九點鐘才起身，這一切我們都應該原諒他，即令比人多消費一點不能認為是缺德。一個「天才」的文學者，他要吃得好一點才能寫文章，他要睡得足一點才能夠休養，有時不能不喝幾杯酒，多交幾個女朋友，但是只要他寫的東西是有社會價值，關於他的私生活上的小節，在今日的社會上是可以原諒的。

但這決不是容忍私生活的腐化，恰恰相反，我們是在社會意義上來估量它的輕重，我們不過不想把這一部份過為誇大罷了。

觀察一個人過去及現在，我們只應注意他的社會價值，他的行為對社會有益，還是有害。

至於觀察一個人的發展呢？就不可不對於他的私生活看重一點。私生活不用說是要影響公生活的。譬如奢華成了習慣，它會造成這人貪污的條件；懶墮會使人消沉下去；酒精會使精神萎靡不振；不擇交遊，不讀書會變為愚昧落伍，會引人沒有主張或失節；生活無規律，會使你不能成大事，對人無信，不負責任，會使社會的人怕你，遠你，這

一切都可影響你的思想，行爲，都可滅殺你的行爲對社會的價值，或者變爲社會的妨害。

所以一個前進的人，不論他是平凡的，或是一個學者，事業家，政治家，他不能不隨時檢查自己的私生活，時時對於私生活方面消毒。因爲私生活的不善，也是不良的社會制度某一方面的促成的，某種社會意識，某一思想，習慣都不是偶然的。我們常常要受到許多不好的影響，形成生活上的矛盾。這在今日，無論你如何前進，都不能說一點沒有影響到。所以在我們的私生活常常現出與公生活的矛盾。諸君！這裡特別值得注意。這一主觀上的努力，乍看起來，好像帶點說教的意味，其實這是一個前進落後人的分水界，不可不注意。

我們對於一切朋友，凡是在公生活上覺得滿意，而於私生活還看出有不善的地方，應該盡批評糾正的職責，却不應拿此作爲評價他的社會價值的法碼，不應攻擊他，而是社會的，善意的糾正他。

不要把人的一切習慣，嗜好，思想，行爲弄得神祕的迷霧中去，應該正確的運用社會學的解釋去解釋一切，求出他的根源，在社會意義下去批判一切。

公生活要超過私生活的估價，但同時不要忘記私生活可以影響公生活。

這樣看法就夠正確了麼？這就是正確的人的認識法麼？

還不很充足。因爲這里還不能忽視生活是變動的這一點。人的生活決不是停止在那里不動。進步的人，不見得不在某一時期忽然站住，或者向後轉，漫步走，落後的人也許因爲生活的變化使他大開快步，追趕上來。所以估量一個人，不能僅從他的現在的行爲如此，就斷定他將來一定也如此，小時候偷過人家的糖，長大了就一定會作賊。這是非常錯誤的。

在時代的大變動中，常常可以看見許多人在那里開快步走，許多人落後了。

但是，這里也有一種限制，就是屬於一個人的社會生活層，常常是一個人轉變的界碑，因爲生活層的限制，常常只能在這一界限中轉。中間層在沒落時代中是可以走過這

界碑的，下級層可以由「自在」到「自爲」，高貴的人們要他往下跑，即令他的生活不得不如此，但旗人說大話，就是窮光了，也還是要帶着貴族氣的。所以，我們也不應對於某些高貴而不善良的人們而作過高的希望，也不應對胡里胡塗的人生出灰心。

總之：認識人雖然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是不可能。這裏包括的知識太多，最重要的是社會的，對人應多看重公生活，看重社會的價值，對己却不能不在注重公生活外，同時使私生活保持公生活的步調，並要使私生活的合理，加強公生活的社會價值。

做事的態度

——答張惟一君——

自貴刊發刊以來，我即是一個忠實的讀者，我對它比自己心愛的愛人還喜歡，時常都把它帶在一起，最近看了答燒餅迷蕭強君等如何生活一文，還有幾個疑點要請教諸先生，可否替我解答或提出公開討論。

在我的生活內容中，曾嘗盡了學校的浪漫，感傷，消沉的種種生活，我又曾當過大學的運動選手，學生會幹事，在失業時，又曾見過牛肉般的面孔，狡猾的眼睛，我又曾到過別國，見到許多欺榨的情形，但我遇到一件事跑到自己的頭上，仍找不出適當的辦法去解決，這不能不使我感覺發惱。

(一)做事態度的問題：我爲了生活有意義，爲了解決自己的生活，爲了認識現實的

社會，我雖不是學體育，但我曾當過一度的中學體育教員，我在教學上並未失敗，我不但教他們操場上的各種技術，並教他怎麼去做人，代他們治療病痛。平常的體育教員，多半只和幾位選手感情很好，但在我，除了選手而外，一切想進步的青年都和我要好，正因了我的努力，同學和我要好，剛做了半年的事，飯碗就打破了，臨走時，爲我事悲憤而送別的人很多，但担心我今後蹈復轍，而勸告我的也不少。他們的忠言是：「一個人不要太認真，太努力了。社會上就是只要自己裝癡，呆，蠢，才能過活，所以今後你不要多管閑事，你這種熱情，是沒有用的。」編輯先生！我確因了自己的熱情，而犧牲學業，追放！失業到了現在，熱情雖然還有一些，但總覺得硬碰釘子是有些不好，你能告訴我，「怎麼才可以免少碰釘子」？「怎麼才可使自己的熱情日益增加」？「對社會服務應抱什麼態度」？「用什麼方法才能充實我們對人對事的技術」？

(二) 如何能在忙中求靜，能有時間看自己所要看的書？……我現在的生活，確是忙得利害，從早到晚，大半都在動的當中過活，有時連到廁所的時間也沒有，因此，我常

感到危險，老是這樣的忙，「自己所存底貨無幾，以後怎辦」？「自己不有鎮靜批判的機會，不有自修的時間，怎能進步」？我自己現在才二十二歲，照理是應採花，不該急着釀蜜，但現在適得其反。編輯先生，你能夠治療我知識恐慌的病嗎？

(三)要自己有專門知識，要自己對人對事有巧妙的技術，要自己的認識增強，我是需要看些什麼書？怎麼樣去看書？書的來源是何處？現在中國的刊物，有那幾種可代解決這些問題？

x
x
x
x

讀完張君這封來信後，使我們更感覺讀幾本書本子易，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問題難，指示人從書本子上去認識人生固然重要，但切切實實，誠懇懇的去討論人生實際的各種問題，則其重要性當超過指示人去讀書本子。我們常常看見許多青年，在學校時他抱着如何高尚的理想，如何積極的人生觀，如何熱心的去從事各種學校活動，這時，書本在指示他，他真的以為學校就是社會的全體，讀了幾本教科書，聽了師長平日一些教

訓，閱讀了一些書報雜誌，常常自以爲了不得，以爲祇要我肯幹，世間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我不能做呢？但是，一旦出了學校，深入到社會中去，眼前現着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書本子教給你們，這時有許多不能應用了。以前自己以爲多才多能的人，現在「遇到一件事跑到自己的頭上，會仍找不出適當的方法去解決」。不僅如此，你有時眼睛會放出可怕的驚異的眼光來。譬如，就拿張君說，張君要做一個很認真的體育教員，這難道也還有什麼不應該麼？是的，一個體育教員除教學生「操場上的各種技術」外，代學生「治療疾病」，「並教他們怎樣做人」，難道還有什麼非議處？除了同選手要好外，也還同「一切想求進步的青年要好」，這也是更應該的。但是，張君「剛做了半年的事，飯碗就被打破了」。

但是，這時候，張君受到朋友的忠告是：「一個人不要太認真，太努力了，社會上就是只要自己裝癡，呆，蠢，才能過活，所以你今後不要多管閑事。你這種熱情是沒有

用的。」

不僅如此，我們也常常聽見社會上的人對剛出學校頭門的人說：「要完全學過」，書癡子」！這並不完全是惡意的，事實也的確是如此。記者在初出學校時，就親自受到自己的叔父教訓過，他說，「你讀了幾年文科有什麼用？還是來跟我做生意罷！」我說：「我又沒學商科。」他反駁我：「你真是傻子！學十年商科也同樣沒有用，商業技術，在你這樣的人，不必學，這些事，可以用人。你跟我走，要學的祇是商場上的奸巧利弊，應酬管人等。」我當時，幾乎被他這一席話把頭弄昏了。

這與學校當日的教訓，書本子上說的，剛剛是相反的一個對照。

自然，一半是今日學校教育與社會太隔離了，它變為孤獨的東西，使學生所學的不免是學非所用，一半是社會的封建殘餘的習氣還太大，使學校教育不得不與它處於絕對的對立，但學校教育的力量太薄弱，不能克服這舊勢力，目前青年的處境是很困難的，這也沒有什麼奇怪。

這裡值得特別注意的，在張君提出的「對社會服務應抱什麼態度」這一問題。

自然，我們不能要張君放棄他過去的態度，反過來接受他的朋友們的忠告，去過那種「老子世故」，「混世」的生活，也不能讓張君繼續盲目的去碰釘子，多多受到「失業」，「追放」等等襲擊。這也絕不是對張君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今日最普遍的一個青年處世的問題，而這類問題，向來又都少被人提及，現在把它作為理論與實踐配合來加以討論，諒來是本欄最有意義的一種討論罷！

首先，我要告訴張君的，「對社會服務應抱什麼態度」，不是一個簡單的可以回答的問題。這裏面是複雜錯縱，曲折多姿的。自然這要看你認識社會的程度的深淺，人生經驗的深淺，運用你的認識到實際中去的程度如何，是否是機械的運用？是否是觀念的，幻想的？是否了解不足？對客觀或主觀方面估計不足？這一切對於你的態度的決定的正確性都有着很大的作用。

一個勇敢的熱情的青年，初入社會，不要把自己主觀的力量看得過于誇大，看不起

其他的一切，也不應過于誇大客觀，把自己變為舊勢力的俘虜。要冷靜一些，不要遇着什麼不如意的事就憤怒懊惱。對你周圍的人，也不要對個人加以蔑視。不要怕「碰釘子」，不要怕自己犯着錯誤。怕的是你「急流勇退」，碰了 回就退縮，不想知道自己的錯誤。只要有不屈不撓的精神，抱有做人應有的，切合時代的奮鬥的目標。至于如何達到你的目的，就不能性急，不能不看現實，不能瞎碰，有時也許還不能不兜一個圈子，灣灣曲曲的去達到。否則，一鼓氣的蠻幹，不握着實踐中的一環一環去進行，要想變魔術似的一會兒變成，必然要碰一個大釘子，自己也就碰傷在這一個大釘子上。

現在且就張君這次打破飯碗的例子來解說罷！我們雖不能十分了解張君所教的學校是一個什麼樣的學校，但就張君來信中說，似乎那間學校的主持人不喜歡教員同學生「要好」接近，是能夠看出的。張君這次打掉飯碗，在張君主觀方面，能夠認真，努力，勤勉，友愛，許多方面都無錯誤。張君的那種熱情，尤為感佩。但是，我們要懷疑的，是張君對學校當局及同事的認識與態度的問題了。

我們決不想憑空武斷張君這次打破飯碗是張君對於客觀認識不足或不善應付，但這種例子，在一般是很多的。姑不妨就一般說罷！

如果學校當局是過于守舊的，一個好的教師，雖有無限對教育改革的熱心，却不能將這熱情隨便應用。你應利用客觀上的可能，先造出一些改革的條件，不能過于急進的。一般教師不願同學生接近，你同學生接近是可以，但不能不有顧忌，不能一個人孤行。你至少應該找幾個與你見解略同的同事，大家去打破這種風氣，使守舊者祇有暗中嘆氣，沒有辦法說你。即令在開始之前，你得不到一個同情人，自己又不能裝癡，裝呆，但對學生的接近就得有一個限度，至少要多多避免個人感情的結合。免得別人懷疑你抱有什麼目的，要利用學生。我以為，如果你能在職務上充分的盡其職責，又能避免一些帶着個人感情聯絡等色彩，主持人怎能說你呢？

其次，就是你對你的周圍人的態度。有些剛入社會的青年，他能「特立獨行」，可是，他同時看不起周圍人的愚行，保守。時時對他們放出輕蔑的冷光。這種過于誇大自

己的英雄態度，固然是一種錯誤，但尤其錯誤的是在增強反對者的力量，對自己的改革事業增加阻力。這一點，不知張君感覺到沒有？

還有，即是對於私生活方面的。這不單就一個學校，一個教師說，一般職業生活都可應用的。在今日的社會內，別人總特別注意你的私生活。本來個人的私生活應該保有相當的自由，別人是管不了的。但是你也得特別留意。一種不好的私生活，在積極方面說，本來有影響所謂公生活，即你的事業的作用，二來，在消極方面，確也有增長人家許多誤解，輕視，煩言。所以，我們對於這方面是責已要嚴，對人要寬。這樣一來，就可減少許多阻力，使你在事業改進上無形中增長了力量。這話自然不是對張君個人說的，這一點對於一般的處世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總括的說，做事的態度，應該在做事中去體驗。這裏應先有對社會對人生的最基本的認識與理解。這一方面在讀書，一方面在碰釘子中去獲得。自然這不是一朝一夕就學得了的。俗話一句言：「學到老，學不了」，就是這個意思。在做事中，不能僅憑主觀

怎樣，不顧客觀實際。祇看見自己，不看見別人，只想憑感情的狂熱，一朝把理想弄成功，不見實際上可把握住的可能性有沒有。除此以外，就是上面說的人對人的態度，你不應看不起你的周圍的人，你不能唾棄他們，離開他們，因為在今日他們也許還不是少數，你離開他們，就是把自己孤立了，你應該在小事件上，對他們放讓，你應寬待他們，甚或可憐他們，在主要事件上，設法說服他們。這裏，你應在私人生活上樹立人家的模範，取得他們的信用，敬仰，然後你才有感化人家說服人家的效力。

等到你在他們中有了相當信仰了，你自然說話和行動都可取得大多數人的同情，支持。你的飯碗也不致這樣輕易的被打破罷！

但是，這種態度如何養成呢？就是不怕碰釘子，咬着牙關去經歷，你多碰一次釘子，多見一個壞人，多遭一次失敗，你就多打開一次你的認識之門，你這樣不斷的邁進，你就可獲得處理一切實際問題的寶貴的，天才的能力。你就可獲得科學的處世哲學。

「不要太認真，太努力，裝癡裝呆」，「不多管閑事」，這些教言，如果不是憤激後的言辭，是至不足取的，因為這是退讓，「媽媽虎虎」主義者消極哲學，結果是變為庸俗的。晉紳先生所謂「世故」，是把人的生命力消蝕，把青年拉到墳墓裏去。

對於這一問題，我們就暫時談到此處為止罷！

其他張君對於讀書的見解，我也還覺得有商量的餘地。張君說「我自己現在才二十二歲，照理是應採花，不應急着釀蜜」，這種看法是不甚正確的。因為張君把「學」，「用」完全絕然的分開，把書本子過為重視了，忽視了做事亦是獲得認識的來源，這一點，幾乎是一般人的共通的錯誤。忙中求靜，讀一點最實際有用處的書是應該的。這並不是說不讀書就一定不能有進步；尤其在我們一面為生活掙扎，一面由自學想得到一點什麼東西的人，不能抱張君這種態度的。

至于「要自己的認識增強，需要讀些什麼書」，如果概括答覆一句，似乎應該是屬於社會科學的。書的來源除自己購買外，可利用圖書館借閱，譬如上海量才流通圖書館就

可供給本外埠的人相當的讀物。「怎樣看法」那問題太籠統，此處不能說它。

「現在中國的刊物，有那幾種可代解決這些問題」，這也說得不明白，我可告訴張君的，你不要希望在某一本書·或一冊雜誌上得到你所要了解的一切東西，這是不可能的，這些東西，多多少少可以供給你一些知識，啓示你如何去求了解，問題的解決，却還是你自己的事。關於刊物，對於我們這類忙人，我覺得比整本的書還重要，因為這些刊物供給我們的東西比起整本書要實際，要概括，我們也容易攝取它。這是值得特別一說的。我們選擇的問題，本刊第一卷中隨時都有介紹，這裏也恕不重述。

不能跟阮玲玉走

——答葉小秋女士——

(一)

「自殺服毒的消息，每天報紙上都有，並不算什麼稀奇；因為大家看慣了，即令是如何悲慘動人的悲劇，也變得平淡了，在一般看報的人的眼裏，大致不過浮現着一層輕煙似的感喟罷！然而，這類新聞對於與那些悲劇中的主人處境相似的人，却有些兩樣，他們特別注意看這些記載，甚或暗暗的在替這些不幸者在流淚，無疑的，這些灰色消息是有許多不好的影響的。

至若像這次阮玲玉的自殺，因為阮的聲名很大，阮的職業的與人不同，她與無數人平日在銀幕上發生了一種關係了，自然，它要哄動一時，變為街談巷議的材料。這半月

來，上海空氣被這悲劇的成份所浸透，自然是不足為怪的。因此它的影響力自然也就大。

在這衆口「談阮」中，我們知道有許多人不過是在無事閒談，或者還是在求開心，或者作為「一代藝人」而興嘆罷了。但是在這熱烘烘的空氣中，也同時有一種另有傷心懷抱的人，格外的感覺對她親切，在那裏為阮玲玉流淚，自然這都是女子，她們真是為阮流淚嗎？不！這很難分別，因為在自己的命運中也看出同樣悲劇的可能性，她們哭了。

但是她們也同樣用哭臉去聽人家對阮玲玉死的批評，她們不知道阮玲玉所走的路是
否正當，說一句更明白的話，她們在考慮自己的生命應如何去處置。

先生！我還親自聽見幾個生活像阮玲玉的姊妹們說：「她有了那樣的地位，也還只能一死了之，她捨得死，我們還能活，還要活嗎？」

這是如何有力的暗示啊！我敢相信今日懷抱着自殺之念，尚無自殺決心的人，一定還多而又多，她們想活，但實踐是太殘酷，讓她們生存的機會是如何少啊！這一嚴重的

暗示，誰能敢擔保不會引起許多無路可走的弱者繼阮後塵呢？

因此，我十分看重輿論了，我覺得輿論是對阮應有一番正確的檢討與評判。可惜得很，現在報紙雜誌都只登些短評，雜感，沒有一篇可稱得負起這任務的文字；在中華日報電影藝術內，雖然出了「專輯」，也還只追問「誰殺了阮玲玉」，對於生者並未有明確的指示；就是在這「誰殺了阮玲玉」中，也還沒有問出最正確的答案來，先生！這不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嗎？

至於在投機家方面，正在把死人做幌子在招搖行騙呢！「阮玲玉自殺記」之類的小冊子，阮玲玉的文明戲，阮玲玉照像展覽以及由阮主演或參加的影片都在做廣告了。「故都春夢」，「野草開花」，「戀愛與義務」，「一剪梅」，「桃花泣血記」，「玉堂春」，「續故都春夢」，「三個摩登女性」，「城市之夜」，「小玩意」，「歸來」，「人生」，「神女」，「新女性」等影片都會把阮的死的消息帶到全國去，從這許多影片上，都能引人想到阮的自殺了！所以，這一自殺的宣傳力與輿論批評的對比是何等的大啊！

我於是想到貴刊了。以指導如何生活爲任務的讀書生活，大概對於這一問題不會作爲一個優伶的死的私事而小視罷！我迫切要求你們對於這次自殺案正確而又嚴肅的檢討與批判，對於生者有具體的指示。」

(二)

我們把葉女士給我們的一封三千餘字的長信摘要如上面的了。我們非常珍重葉女士的意見。阮玲玉的死，本刊雖然也只略略的寫過一篇短文，載在社會相內，但並不是把她作爲一個優伶的死的小事看待的；我們在那篇文章中，完全是作爲一個現代中國婦女問題提出；不過，只僅作爲一個警號而提出罷了，對於阮的這樁公案，當時沒有去詳細檢討它。

是的，一直到記者撰覆此文時止，據記者眼界所及處，似乎這類工作還有再做的必要；因此，對於葉女士要求的解答，我們覺得是更有意義的。

首先，我們來檢閱葉女士所指的輿論罷！不錯，輿論是「熱烘烘的」。大家都在「談

「阮」了，日報，期刊，街談巷議都在談阮了。「談阮」中，固然因爲各人的看法不同，對阮說了許多相干和不相干的話，但也仍然有一致在，那就是對阮的悲痛哀吊，對阮的電影藝術的嘆息，同時有人在追問「誰殺了阮玲玉」。大家都爲阮家的喪事弄得有點昏昏然了，却很少像葉女士這樣冷靜的人，在熱鬧中，偏偏看出悲劇以外的悲劇的影子，發出救救活人的信號。就是在追問「誰殺了阮玲玉」這一問話中，也大多僅僅是站在爲這「藝人」個人復仇的觀念上。他們多數只看見阮玲玉這一個女子，看不見這是一個婦女問題；卽令看出這是一個婦女問題，最多也只像本刊第十期「三八悲劇」所發出的那樣的一個警號，甚或還更模糊不清，抽象的說教而已。

所以在「誰殺了阮玲玉」這一問話下，答案就有：

一．「三瓶安眠藥！」——一位小報記者說。

二．「你不殺伯仁，伯仁因你而死；張達民！我看你怎樣逃得過這個輿論？」——這是一般報上引用阮女士的遺書。

三·「都是你們報館裏人，把事情胡言亂語登了出來，害死了我的小女。」——阮母對新聞記者說。

四·「市僧唐季珊的欺誘和玩弄。」——許多報紙皆同。

五·「現在這個社會是一個崇拜金錢壓迫女性的社會，這是明明白白擺在我們面前的殺人的兇手。」——新生

六·「阮女士本身的缺點，知識不夠。」——不正確的意識殺害了她自己。」——電影藝術。

七·「生活與意志的矛盾」，「毀滅於這矛盾中。」——申報影專。

八·新女性影片的教唆。

自然，還有許多，都可歸併到這八項中去。如我們還聽到她家庭中日常生活中許多悲劇，爲唐季珊另有所歡，她被唐季珊冷遇，虐待等，這可歸入第四項。目前的復古的空氣，封建勢力的猖狂，這也可歸到第五項社會裏。什麼「名譽」殉訟」等自然可以包括

第六項。以外也還有人說她在影壇上，已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穩了；據記者親自探問的結果，又據說這不確實；卽會是真的，也可以包括第六項裏。

我們對於上面這許多答案，除第一項我們覺得太朴素了，有點像小孩子說的，現在不去管它。第八項，這明明是不懂悲劇的人過爲誇大的外行話，也不多贅以外，其他各項我們認爲都對，也都有缺點。這怎麼說呢？就是以上的估計阮玲玉的自殺，或是太偏於一面了，或者就是太抽象不具體。是的，我們應具體的研究阮玲玉的自殺，但不能把它看做偶然一個刺激，一個什麼敵人，一種什麼輿論那樣簡單，也不能空空洞洞用一個社會來包括一切。用一個「無知」或「不正確的意識」歸罪她自己，就可說盡其能事了。

我們知道，自殺決不是一種簡單的行爲，阮玲玉的死，明明是由許多複雜的因素綜合起來，在她的意識上起了質的變化，形成突變時才發生的。所以上各項都成爲她死的因素之一，但單獨某一項都不會使她吃安眠藥。

把許多因素綜合起來是否就能了解阮玲玉的死呢？仍不能的。我們還要追問阮玲玉是屬於那一個社會層的，不然就會成爲空洞不着實際的考察了。

「阮玲玉是小有產者羣中的一份子」。不錯，她出生，成長，死亡於第五項所指出
的社會內小所有階層中。那末，她的自殺過程是一幅怎樣的圖畫呢？

「她的生活決定她的意識」。她的行爲通過她的意識，她對於世界的事物的認識也是通過她的意識的。雖然她所出生的社會層的意識已隨着這階層的沒落而日趨瓦解了，這一羣中對於新的意識已有不少的先覺毅然接受了，至於她，雖然做了「新女性」的主角，接觸了這一面，却並未了解「新女性」；在藝術上（就新女性一片說）僅僅成功了韋明型的頹廢面，却對不起這一悲劇，她這一死把她在藝術上的成功變爲虛僞了。她纔成了導演的一個傀儡，不能與她所具形化了的藝術融合爲一。因此，以上許多因素，對她才會發生巨大的壓迫威力，置她于死地。

她會害怕社會揭穿她的私生活，才會那般看重貞操觀念，才會那樣對戀愛不了解，

才會那樣擔心自己的地位，才會那樣受不住輿論對她的冷嘲暗諷，不敢到公庭上爲自己人格與權利辯護，不敢解除唐季珊的虐待，不用奮鬥來維持，增高自己的藝術的地位，不用奮鬥去開闢自己的生路，只是抱着一個薄弱的意志，看看現實不對，看看自己是如何可憐，無辦法，於是，只有一死了之了。

你不要以爲那個小報說出孩子的話就完全一點意思沒有。不！安眠藥在她的自殺中，仍然盡過劊子手裏的刀的作用的。因爲拿着這刀的人，是她自己，所以很容易被人朦混誰是真正的劊子手，這一公案就變得更危險了，更可怕了。

這正兇是誰呢？我們雖然可以這樣問。但我們知道並不是某一個人。把責任要某一個人去負，都是不對的。不是某一個人，就歸責社會罷！對是對的，它的本身是社會造成的，可是未免太攏統了。我們可以分析出：阮玲玉死的客觀的原因，是以第五項所舉的社會基礎爲其基礎；而以目前復古的氣氛，市僧流氓的依仗金錢，男性的權威玩弄女性的無賴，輿論利用所謂軟性新聞以推廣營業及替流氓侵害弱者，以及其他等等，縱橫

交織構成了阮玲玉自殺過程的整體的客觀原因。自然，沒有這種基礎，自然不會發生張達民這些派生物，沒有張達民這類人及事也就不會有這悲劇看了。但是，在考察這一公案的客觀原因之餘，不能對死者以一掬同情之淚了事；因為自殺到底不比被殺，如果阮玲玉不是她那沒落社會層的支持者，她是不會採這條路走的。我們不能因為她是一個弱女子，而且是被人逼死了，我們就不深責她，就認為有傷怨道，這種觀念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愛護阮女士，同情阮女士，同時我們亦應找出她自己應負的嚴重的錯誤的這一面。

同一樣客觀的環境下，不是還有千千萬萬的女子在生活着麼？在血的，淚的生活中抗爭麼？

只有檢查出了她死的客觀原因，我們才知道我們應向什麼方面去努力。現代中國的婦女問題，到底是一個什麼問題，它應如何去運動呢？

只有檢查出她的主觀的原因，她的嚴重的錯誤，出來，才是對千千萬萬與阮玲玉同一生活內容的姊妹們當前的一帖清醒劑，使她們在同情之淚中，覺悟過來，從這一刺激中，先救出自己。

爲了尊重阮玲玉，我們應把她的死作爲一幕有價值的悲劇。它嘲笑，諷刺社會了，我們大家應負起奮鬥，改造社會的責任；它喚醒了無數的姊妹們，我們姊妹們就得大家走上用血與力去爭婦女解放的勝利的道路。

否則，阮玲玉之死，一定要生出消極的作用來，葉女士的担心，決不能說是神經過敏。這是可能的，因爲生在今日這般陰險艱辛的社會裏的姊妹們，無路可走的是太多了，誰能保障她們不會在無可如何認識不足中誤步阮女士的後塵呢？

(三)

以上對於阮玲玉的自殺，大略的檢討與批評過了。我們對於自殺是極端反對的，我們同時也不滿與論界持什麼「爲了生活的嚴肅，爲了自己對人生的正視，覺得自殺反比

許多人的苟且偷生是更加勇敢」這類消極道德的說教，這種死的清高，在現時代是不值錢了的。

姊妹們！再不要柔懦的不肯打開眼睛啊！在閨房中做的春夢，在學校，電影，運動，商店等等領域做的皇后夢，大學授教，達官，貴人，買辦的太太夢，以及一切享樂虛榮的幻夢，與目前社會實踐是相違不止十萬八千里的。這種幻夢的結果，阮玲玉代你們說明了，有人對阮玲玉一生的幸福估計說，「做了兩個買辦的太太以後，她真的得到的幸福是死後睡了一口玻璃棺材。」這話雖然說得過於刻毒，但你也不能指出他的錯誤呀！

至於如何奮鬥呢？這問題太大了，不是幾句話可以說盡的，本刊對於這類實際生活問題，常常都有討論，我希望讀本文的讀者，尤其是女讀者，多多的加以注意。現在在這裏可以指出的是一個人無論到了什麼田地，我們應該把握着「死是可以的，但不能由自己動手殺自己」。有了一口氣總要幹一番。社會無論如何險惡，我們一面要冷靜的對它

觀察，認清爲什麼會有這樣險惡的原因，如何剷除這一個原因；不是對它害怕，退讓，或屈服。新女性要趕快丟掉傳統下來，切過於看重貞操的觀念，及性的方面許多封建的意識，趕快吸取新的科學知識；尤其是教你認識社會的社會科學知識，自己不要以爲是女子，什麼事都不能做；你要大胆出來，什麼事都同男子一路去幹，負起你在這一時代，你應做的事。

是的！要更堅定你的新意識，不要從戰場上敗下來，一面要吸取新知識，一面要在生活中去磨練。不要怕碰釘子，不要太怕釘子，釘子太多，自然是社會不好，所以我們要改造它，我們更應看得很平常，一個一個去打掉。我們甯可以把這短小的一生做些開荆斬棘的開路工作，讓後代人有好路走，我們不應看了荆棘就害怕得自殺，讓荆棘存在，毒蛇猛獸猖狂。

論所謂「桃花慘案」

——答陸伯翔君——

『自從上海鬧過阮玲玉自殺慘案後，接着北平又鬧出什麼「桃色慘案」了。

案情大致是怎樣的：一位名叫遂明的，是一位運動家，家中據說本有一位舊式老婆，後來離婚了，遇到滕爽女士，發生了戀愛，其中他們又發生衝突，遂明轉而愛上一位劉景桂女士，並由愛而訂婚。可是訂了婚之後，遂明復與滕爽結婚，因此劉含恨遂滕，劉起了殺人報仇的心，結果她槍殺了滕爽。劉在告國人書中，說「她認滕爽是破壞他們愛情的人，故發誓殺她報復」。但以後，她又說「本想殺遂明，因為她自己係一弱女子，而遂明則一勇武男子，恐力不從心，故殺滕爽以洩其恨」。在審訊時，劉又云：「購手槍後，原欲殺死遂，因百元用完，無旅費赴下花園，故打死滕爽，而使遂明精神痛苦」。

案情的性質是情殺，這是用不着更詳細敘述的。

不過，自從劉案發生以來，幾乎無日不在各報上可以讀到這件案情的新聞，報紙利用了「小姐殺人」這種軟性的所謂桃色的消息，誇大的記載，曲折細膩的描寫，引動青年男女的好奇心，以推廣他們的銷數。因此，這桃色慘案就騷動了故都了。致使地方法院門前聚集了五六千男女，演出空前未有的熱鬧，街談巷議，也大家都在談這位殺人的劉小姐了。

我也是這熱鬧場中的一位觀眾。我極關心輿論界，婦女界對這椿大案有一個正確的批判。但我要聲明的，我不袒劉或某方；我老實說，我不過于注重這案子的判決與他們當事人的得失；我的注意却是這案子給與廣大的青年的影響。可惜現在的輿論界尚沒有一篇像讀書生活清算阮玲玉（讀書生活第一卷第十期「不能跟阮玲玉走」）一樣的文字出現。因此，我特要請教你們，是否也能像清算阮玲玉一樣，給無數青年男女對這一公案有一番正確的批判與指導呢？」

騷亂故都的所謂桃色慘案，的確也傳遍了全國了。我們也與陸君一樣，不過對於這案本身的發展特別感着興趣；因為就這案子的內容說，簡單得很，北平地方法院既然開庭審理，自然法院可以根據刑法作成判決，似乎無容我們多說閑話。至于對於案中人呢？就犯罪行為說，既然都是屬於個人的，社會意義自然很少，也覺得沒有什麼話要說。我們對於這一公案的觀感，頗與陸君之見相合。我們只覺得這是一幕悲劇，而劇中人是中國中產社會的青年，這幕悲劇至少透露一些中國中產社會青年們對於性愛問題的見解，這見解是正確與否，却不能不認為是一個較嚴肅的問題。這一悲劇我們看過後，我們還是嘆口冷氣默然無語呢？抑或對於這幕悲劇還要說幾句話，使這成千成萬被這新聞所迷惑的青年，藉這悲劇來認識認識這一面（性愛）的人生呢？

現在姑就這一悲劇的意義，來與陸君及對這一問題關心的朋友們一商榷罷！

我們首先要認清造成這一悲劇的是什麼。不錯，它發生在今日的社會，自然是因為

有它出生的土壤。不過，我們却不可這樣空洞地把它歸到社會制度上去，就算說明了它。不！這種說法是不夠的，我們雖然不否認在這種土壤中有發生這一幕悲劇的可能性；但決不能說，這種悲劇就一定不可避免要發生的；並且這種可能性在今日的我們看來，是可以不讓它成長的。

因為這一悲劇的爆發是通過了一種不正確的性愛的見解的。這種錯誤的性愛觀，却是造成這一幕悲劇的根源。

現在我們來檢閱這一悲劇中的人對於性愛的見解罷！這裏面有三個人物，滕爽女士被殺死了，她的性愛觀我們無法知道，這裏表現的最明白的是遠明與劉景桂。遠明對於性愛至少已明白的表現出無壓的慾望，是誇大的，浪漫的，享樂的，我們不必說他什麼「沒道德的男子，對女子用情不專，又具玩弄女性的性質」（見獨立評論一四六號俞大經「論劉景桂殺人案」等話。劉景桂的殺人行爲以及她的告國人書和口供，都充分表現是戀愛至上主義的人物，她那妬焰，怒火，都是把性愛過爲誇大，視它高于一切；因此才

肯以「復仇」來毀滅人，同時也毀滅自己的整個的人生。

他們倆，姑無論對於戀愛誰是真誠，誰是虛偽，但總爲了它而犧牲了人生的其他，人生中更重要的部分。他們倆都是把這性愛的碎片，代替了整個的人生，毀壞了他倆的人生。

是的，現在的中國青年，尤其是目前中國實踐下的青年，他們應該認識他們所負的時代使命之巨大；戀愛問題，對於前進的青年應該是不甚重要的問題。

過于把性愛誇大，所謂性愛至上主義是危險的。青年男女沉溺于性愛生活，把愛情過度的高昂，瘋狂的愛的行爲，都是浪費青年的健康和力量，甚至毀滅自己。

由劉景桂主演的這一幕悲劇，明明白白是一種浪費，是時代不需要的排演。

然而，我們並不是禁慾主義者，並不主張青年男女都去過和尼姑的生活。我們也不主張那些禁止男女同行同校以及禁止男女在一個池子裏遊泳，不准男醫生檢驗女學生的身體等這些奇怪主張。我們不過不想把性愛過爲誇大，我們要把它作一個適當的估價。

我們很想化神祕爲平凡，因此我們覺得有人把性愛比作口渴了要喝水，肚子餓了要吃飯一樣平凡，再適當沒有。

青年男女無論在身心兩方面都須要異性的安慰和滿足，但不可超過一定的限度。太多喝水，多吃飯是有害衛生的，太沉溺于性愛，其危險就比太多吃東西還來得大。

在飲食男女以外，人還有其他更豐富的生活。

我們又同意有人勸青年人運動，研究學問，或從事社會活動等去減低性愛的慾求的比重。不用說這是最正確不過的佳言。

這種觀念，無疑問的，在今日的中國青年的腦中尙未造成一種普遍的觀念。不！恰恰相反，戀愛至上主義，在今日中等社會的青年男女間還有絕對的勢力。它在五四以後，首先以反封建的姿態而躍出，頗有一點積極的意義，可是現在確是陳舊的東西了。它變了時代的浪費的悲劇。

所以劉景桂殺人案並不能看作偶然的，我們雖不敢說這是某一部份青年的墮落，却

可說是一種不幸的現象。倘若遂劉對於性愛有了正確的觀念，遂明不會要過這樣浪漫的生活，劉景桂又何至因與遂離，而要懷恨殺人報仇呢？不是遂劉都有更重大的事業在眼前，使得他們終生奮鬥的麼？

我們覺得嚴肅的地方就是在他們的認識上，對於性愛的見解的錯誤上。

這是讀這一幕悲劇的人所應了解的。

我們還希望與遂劉同一生活內容的青年男女們，讀完這一幕悲劇後，自己起來撕碎你們心頭的腹稿罷！這悲劇是不應再演下去的。

阮玲玉的自殺，我們曾經高喊着，「不能跟阮玲玉走」，已引起了許多青年的同情了，我們現在又向更廣大的青年男女朋友發出這信號了，「我們更不能跟遂明，劉景桂走。」

如果從這次悲劇中，大家能得一點認識，那這幕悲劇雖然是浪費了，却在意外仍有它的收穫，這就作為滕爽女士的犧牲的代價罷！

我們對於這一公案裏的死者生者雖然都抱有一點惋惜的同情，不過這是用不着再三致意的，我們希望的却是千千萬萬的生者，趕快起來洗滌自己對於性愛見解上的沉澱。

把你的一切精力安放在時代課于你的肩上，陸君！這一點意見，暫時作爲你的參考罷！

人和環境

——答周鵬，鄒傑，方叔平三君——

近來有許多朋友因爲在生活的掙扎中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常常發生絕對相反的兩種意見。一種人看了當前的環境的惡劣，覺得無法去改造它，生出對於「人可以克服環境」這種話的懷疑，同時覺得「環境支配人是千真萬確，人改造環境可是一件難事，或者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想着：「歷史上的偉大人物能轉移時世是事實，但他能成其偉大，也還是由于他有較好的環境」。這樣一來就更覺得眼前包圍了自己的這黑漆一團糟的環境咄咄逼人，只好讓它去逞魔力，玩弄自己，自己除嘆氣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鄒君把自己過去奮鬥失敗的一切責任都委之於環境不好；周君呢，也輕淡的發出「人可能單獨改造環境麼」的感喟之聲來。這是屬於環境的悲觀論者的一面。

另外，有位方女士，他與我們一連通過四五次的信了。她的見解完全與以上的相反。她否認環境可以支配人，她說「一切失敗都是由于自己沒有力量，不好」，「人定可以勝天」，「人是萬物的主宰」，「人爲萬物之靈」，「人可以爲所欲爲」，「一切不幸的人都是由于自己的不努力，不能錯怪環境不好」。這是屬於主觀努力絕對樂觀論者的一個例子。

但是，我們對於這三位朋友的意見應該如何來加以批評呢？是的，我們不能同意任何一面，卻也不是那種折中之論，一方面承認一半。因爲周方二君只把眼睛看看環境，或是專看自己的一方面，是一種形式的，靜態的看法；至于那折中論者，也不過將人和環境作兩方面的看法，再作一種凡俗的持中之見，都不是正確的看法。

這一點，我們要首先不客氣的指出。

先就周鄒二君說。他們是太把環境的勢力誇大，把環境同人分開，把人的力量看得幾乎沒有了。同時把人類整個的力量或者大多數人的力量與個人的力量混同了。所謂「

人可以克服環境」，自然不是說人可以離開環境，爲所欲爲，純憑一己的幻想，就能創造出一個美麗的世界來的。這句話同時沒有否認人是環境的產物，時時刻刻要受到環境的影響。但是不是人就被環境束縛得一動也不能一動呢？不，決不！人一面是環境的產物，要受到它的支配與影響，但人仍能自動的改變環境，使環境更適于人類，或箇人的生存。這我們只要打開人類進化史來看，它就告訴了我們人類如何的與自然抗爭，與人抗爭。人類社會是如何的一天天變得更適于人類的生活了。

同時，我們又看見，無論人類如何努力，燧人氏（假定上古時代有這樣一個人）那樣的發明家，在當時也只能鑽木取火，却不能馬上運用電光。中國目前喊復興農村，却不能像蘇聯一樣，全國登時改造電犁機，集體農場，這是什麼原故呢？這就是說，改造環境也仍不能離開現實的環境，不管現實的環境的物質的發展力。（即社會生產力）在燧人氏的時代，克服自然，改造環境只能做到鑽木取火，只能生出燧人氏這類人物，却不能產生愛迪生，發明電氣的用途，利用電氣。中國倡「復興農村」不能馬上主張集體化，電

氣化，就是因為中國工業太不發達，沒有使農業機械化，集體化的條件。這就是說明了人類可以克服環境，但不是任憑人類的幻想的，它仍然要受實踐的環境所限制。

這就是整個人類或一個民族國家共同努力克服環境說的。

講到個人或一部份，「可以克服環境」，不全屈伏于環境，也不是假話。圍繞着個人的環境，是自己先存的大社會，及包含在這大社會中的小世界。譬如就鄒君說，他的生活的環境是中國大社會和他的職業小世界，即百貨商店，這裏鄒君個人的利害，幾乎是與一般店員相同的。鄒君對於他的小環境自然是萬分不滿意的，工作時間太長，沒有自己讀書的時間，工錢太低不夠一個人的生活，店內進東洋貨，不愛國，一般同事的醉生夢死，不足與談。這一切在鄒君看來是黑漆的一團，說要改造這樣的環境，試問如何去改造呢？反抗老闆的虐待嗎？一個人出頭要求增加薪金，減少工作時間嗎？反對老闆進東洋貨嗎？哼！這都是鬼話，這年頭兒，除非你打算混飯吃就罷，否則還是安分些好，這不是明明白白環境支配着個人，不准你一動也不准你動嗎？

這種情形，確容易拉人向悲觀方面走的。不過，其實仍是自己觀念上犯着錯誤。這裏把個人與他人同一的利害將它分離開來，以一個人來代替大家，所以乍看起來是不能不悲觀的。譬如鄒君的職業環境的改造，明明不是一個人可能成功的。但又不能不去作個人的努力，這是怎樣說的呢？就是說要徹底的謀得生活的改善，幾乎就是整個民族解放，社會制度改善的問題；即就小焉者說，要加一點工錢，減少半小時工作，不進東洋貨，不僅不是鄒君一人之力可以轉移，也幾乎不是一個公司的人協力行動可以做得到的；這應該由同業低級職員共同奮鬥長期努力去爭取。鄒君看不見這力量，只看見一個渺小的自己，自然，不能不覺得當前是黑漆的一團了。這沒有什麼足怪的地方。

或者鄒君要說，我雖然知道應該如此，無奈大家不明白，都怕掉飯碗，要等待大家覺悟，恐怕中國早亡了，我們早已餓死了。索性不管它罷！當亡國奴，做餓死鬼，不懂我鄒某一人！這就是大錯特錯！

何以故？所謂改造環境，自然不會一帆風順的。改造原是在黑暗中，是一種長期的抗爭；不然就不叫改造了。能夠克服環境的人，是在艱難困苦中把握住一些實踐的可能性，努力使這些可能性變為現實。例如就鄒君的環境說，要達到以上的目的，雖然不易，可能性却是有的。店員無論如何頭腦昏亂，他在生活鞭撻中，總不能說沒有清白的一天，說服他們的醉生夢死，是有機會的；稍微改善一點生活待遇，只要店員行動齊一，也不見得辦不到；反對進東洋貨，更以利用社會輿論的力量去影響，造成一種社會的裁制力，這一切的條件，如果在一個百貨公司造成了，自然登時可以影響，推動你的同業；等到大家的情形都達到某一共同點了，說不定可能性就會變為現實的。不過，這裏我要加重說一句，所謂一個個人對於環境的改造，却不能眼睛只看見自己，或自己同一職業幾個人，你依然要看遠一點；須知沒有大社會（或國家）安全，這些合理的條件，個人，或少數職業集團的生活是不會好的。所以，關於個人從下爬上樹枝的成功，這裏不想去多說它。

我們在奮鬥中，也許自己一無所得，反而破壞了個人較好的私生活，或者遭到失敗，但這失敗並非沒有所獲。一個個人，閉着眼睛，只看見自己個人一時的利害，以巴結老闆，討好老闆奶奶，或者用什麼取巧的手段討人歡心，以圖個人往上爬者，雖然偶然也有成功的，改變了個人的環境的，但這種犧牲他人，僥倖的得到改善，不能算是我們所謂克服環境，那只能算是真正的屈伏環境，甘心做阿貓阿狗去適應環境。譬如，東北有些漢奸，他在張學良時代還是一個無賴的窮措大，但是他做了日本的順民後登時就富貴起來了。這不能說他善于改造環境，就是一個好例子。這種凡俗的，只顧當前個人利害，不打開眼睛看遠一點的「實用主義者」，說一句得罪胡適博士的話，連他也在內，不足語「克服環境改造環境」的。

鄒君大概錯把自己過去許多生活，在奮鬥上的失敗，都看做沒有什麼收穫了吧？鄒君！你把個人力量作成大眾力量固然是錯誤了，你把個人為大眾利益而奮鬥的失敗，看作是全無收穫，也是錯誤了的。改造之事的確是不容易的，但你如果明白改造的過程，

把握住了實踐的過程，以及看清了個人是社會的一小單位等，就不會徒然喊難的。

至于俗語說，「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這兩句話的真理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說要有了東北事變，才會產生民族抗日的英雄，這就是指時勢造成的。但爲什麼不能人人成爲抗日英雄呢？英雄爲什麼有時也不能保持晚節呢？這就說明光止有了這樣的環境，或稱作「時勢」，如果不自動的去握住這「時勢」，去引領大衆站在民族危機的最前綫，爲民族去抗戰，却只坐在家內，這民族英雄的頭銜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這就是東北事變後，有許多人成爲大家崇拜的人物，有許多人在被人唾罵的緣故。反過來，英雄造時勢，這句話一向被人看作真的只是英雄個人造出的時勢來了；其實不然，英雄之成功，仍然是要歸功于大衆的。一個名將「戰必勝，攻必克」，是他的軍隊集體之力，不能專看做是他個人的力量。所謂英雄也者，也不過在某一個時代，把握住了大衆的要求，最勇敢的站在前綫去執行大衆的意志，比別人或者做得更重要，更多一點事罷了。並不是不管一切環境，不要一切條件，英雄可以從空想中造出一個世界來的。但也決不是由于他

自己有較好的環境（這裏是指他個人的，不是指時代）。

所以人與環境的關係是環境固然決定個人，但個人也可以影響環境，改變環境，這兩者的關係，是不能抽象的專從人，或環境一方面去看的。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會對於個人或環境，某一方面作過于誇大，或過于輕視的估計；因此不會對於某一方面畏縮，或誇大。

現在要反過來對方女士請教了。方女士那種否認環境說，看了以上的話，大概可以不攻自破了罷！方女士是大學生，根據幾次來信，我們知道士的生活是非常富裕並且自由的，女士的家庭環境及目前不良的教育，造成了女士對於人的誇大病。我們不能專責女士。至于，「一切不幸的人都是由自己的不努力，不能錯怪環境」這句話，存有幾分真理，我想，是用不着我來贅述的罷！

自然，我們不是環境論者，一切都委諸環境不好，把人看成了完全被動的東西，但我們不能像方女士那般在空中說話，忘記了自己是生在地下，生在今日的中國社會，是

中國今日的社會的產物。

中國民族目前的環境是到了非常的危機與困難的，但克服這危機與困難，是我們努力改變這不利于我們的現實，而成爲利于我們的條件，不是完全無希望的絕望。因爲改變環境，造成時勢到底還是人類。這末一說，我想，這一個平凡的問題或者倒不是完全無意義一通回信吧！

論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

——答金放然君並求教於張季同先生——

「最近有幾種刊物上都談到哲學的重要，說明了哲學並不是什麼神祕的東西，不是不務實際的人，出世的或消閑的玄談，研究哲學的人不一定要是文雅幽深的哲人，而每一箇爲衣食奔走的人也一樣應該有正確的做人的態度。箇人需要有哲學思想，一個國家在某一時代要有一種共同的哲學，這無疑的，我認爲這是中國學術思想的進步。

在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十三期上，我更發現了張季同先生的「論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的文章。這真引起我的興趣不淺。因爲研究哲學的風氣現在雖然被人提起，但像張先生這樣明確提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哲學，實在比抽象的論哲學要來得更爲具體，因此張先生這篇文章的重要性也就可知了。

不過，在讀完張先生這篇文章後，我仍不能不懷疑，仍不能認明張先生給我們的所謂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到底是一種什麼哲學。現在爲求澈底明了起見，特將張先生那篇文章的要點，摘錄如后，並列出我的疑問，請你們給我一個明白解釋。

張先生認爲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要具以下四個條件：

- 一，能融會中國先哲思想之精粹與西洋哲學之優點以爲一大系統。
 - 二，能激勵鼓舞國人的精神，給國人一種力量。
 - 三，能創發一個新的一貫的大原則，並能建立新方法。
 - 四，能與現代科學知識相應合。
- 因此，張先生認爲，在內容方面，就應該具下面的性質：

- 一，在一意味上是唯物的。
- 二，在一意味上是理想的。
- 三，是對理的。

四，是批評的。

這是全文的綱要，我的懷疑處：

一，中國目下哲學所需要的條件不知張先生是根據什麼確立下的？是根據中國客觀的實踐呢；還是憑張先生覺得怎樣就隨便定下了這四個條件呢？

二，因此，對於第一條件，我不知道所謂融會中國先哲思想之精粹與西洋哲學之優點，是如何的融會法？「精粹」是怎樣標準拔出；優點又是以什麼為標準呢？如何使這二種東西融會呢？

三，能激勵鼓舞國人的精神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給國人一種力量是什麼樣的力
量，又如何運用這力量，對誰運用這力量呢？

四，中國現在所需要的哲學真的需要另起爐灶創發什麼大原則，建立什麼新方法
麼？

至于在性質方面，我也認為太不明白，並沒有具着中國的特殊性，他指出的四點，

可以說一般的時代都是可以應用的。

我有了以上的懷疑，但我却沒有批評他，說服他的力量，諒來也不僅我一個人的罷！務望對這問題公開答覆。」

× × × × ×

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是什麼呢？這不僅金君對它生出興趣，我們也是抱着金君一樣的熱心在研究張季同先生的文章的。金君以上所提出的懷疑，我們也同樣的感到，張先生那篇文章，無疑的是有毛病的；是沒有給我們明確的指示出什麼是我們所需要的哲學。現在且就我們所看到的逐一將金君的疑問加以解答罷！同時，我們也誠懇的希望張季同先生對我們的意見給與指教！

金君懷疑張先生最基本的一點是不知道張先生根據什麼作成那四個條件，那懷疑是完全需要並且是應該有的。這一點也就決定了張先生這篇文章的價值。

張先生說「他國的哲學思想本都是為適應各該國的需要而產生」，這是對的，這裏

所說的需要是指客觀實踐的需要，但中國的客觀實踐需要什麼？張先生並未告訴我們。張先生告訴我們的是「大系統」，「精神」，「力量」，「原則」，「方法」，「科學知識」等東西，是從哲學出發而談哲學；是離開中國社會客觀實踐而言需要，而談適應，所以金君覺得張先生只是憑着自己主觀在定下什麼條件，這不是金君的粗心，而是實在的事實。

中國現在需要什麼哲學？這要由中國社會客觀的實踐的需要而決定。哲學的思想是社會心理的結晶，社會心理是社會層間心理的集中的表現。而這心理的形成又由於社會經濟關係，與政治制度所決定。哲學思想如果與下面的基礎不調和，則這種思想就不是需要的，反之，它能作用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成爲行動的指針，是需要的。這是最基本的原則。

中國今日需要什麼哲學，首先，我們就應本此原則去認明中國社會今日的實況。

不要迴避現實啊！不要懼怕真實啊！中國目前的實踐是一個極端複雜多樣的構成體，在急速度的動盪中要求新的存在，新的發展。這裏成爲這複雜的動態的主張，和民

族行動的總標誌的，是要求民族領土的完整，及爭得民族解放終局的勝利。這裏自然包括政治的獨立，經濟的解放，文化的更新各方面的勝利的意思，不應是狹隘的某一方面。

但是如何方能保持中國領土的完整？如何爭得民族解放終局的勝利呢？那是不能靠上帝的，這裏是要用血與力去換得它。維持領土完整，不僅是要保持現有的，還得收復失地，這就意味着突破當前民族危機的意思，要突破當前國難，才能講到取得將來解放的勝利。這一切客觀的要求，無疑的都集中到力的戰鬥上。只有這一民族生存的鬥爭，才是全民族共同奮鬥的標誌。這才是實踐的真實，一切上層構造的基礎。

從這種實踐，需要什麼樣的哲學呢？

需要能作為這偉大民族的指針的；能推動這偉大的戰鬥，造成這一戰鬥順利進行的條件，並完成這種戰鬥的勝利的。凡妨害這種戰鬥，不論在那一領域中，都不是需要的，要唾棄的。

如果依據這實踐，關於張季同先生所定下的四個條件才不是空話；才可以有實際內

容的回答。金君第二疑問，我就可以回答，中國先哲思想之保存與棄置，西洋哲學之吸取與堅拒一概以是否有利于我們當前的奮鬥，能成爲我們的行動的指導爲取捨，這不是明白而又簡單的麼？所謂「融會」也就變爲平常，脫下了神祕的外衣了。「融會」只有在實踐的奮鬥中，才可以談到啊！不是想像的作合呀！

關於金君的第三個疑問，那也要有了實踐的基礎後，才能說「能激勵鼓舞國人的精神」是民族戰鬥的精神，「力量」是民族集體的力量，是運用這力量去完成我們解放的目的。

至于金君第四個疑問，我們也認爲金君疑問是應該有的。中國的新哲學，是包含在世界新哲學體系中，用不着要另起爐灶，創發什麼大原則，建立什麼新的方法。不要把特殊性太誇大，否認了一般性啊！

總之，在張季同先生的文章內是交代不出以上的回答的。我們對於張先生所謂「最少須能滿足」的條件，可惜完全是張先生頭腦中的產物。

由張先生所臆造的條件而規定出來的，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的內容，怎能不是「沒有具有現在中國的特殊性」的東西呢？

不錯，新的哲學的內容應是「唯物的」，辯證的（Dialectical），但爲什麼要加上理想的呢？這不是反把視線擾亂了麼？唯物，辯證的，自然就包含着理想，批評。張先生！新的哲學是戰鬥的，它應是行動的指針，它要指揮着殘酷的戰爭啊！在實際的戰野上，在精神的戰野上都不能例外，難道還會忽視批評的，理想的麼？

自然，張季同先生的這篇文章，明明是在半空中說話。沒有實踐的基礎，所以也就缺乏「對空性」，雖然張先生在主觀方面或者不自覺，而實際則變爲哲學者客室內的談話，並未有觸着「現代中國」，所以就說不到它的實際意義了。

我們所見如此，寫了這一點以供金君研究的參考，同時敬候張季同先生的賜教。

葉青先生的方法論

——答左光華 劉士驥二君——

(一)問題的提起

近來有不少的朋友由研究邏輯(指動的邏輯，下仿此)，注意到邏輯的運用，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本來邏輯這東西，不在實踐中去理解是不能獲得真正的了解的。一個研究者要了解當代的邏輯家，也只有從他的對於現實各種重要的問題所提出的意見中去理解，才有認識他的可能；一個邏輯學者的真正面目也常常無情的被這實踐所表白了，他無法逃避這一試金石的，因為他是一個過着現實生活的人，他不能對當前的現實生活終生的沉默不說一句話罷！所以專門的賣弄邏輯辭句的學者，祇能成其爲「學者」，他並不能真正的懂得邏輯，所以，一個邏輯的學生，在開始研究之時，一方面固然應該虛心的

去讀那些不折不扣的邏輯家的邏輯著作，及其他對於現實問題的言論去學習理論與運用，同時，也應該虛心的去博覽許多冒牌邏輯家之言論，從反的方面去辯證真理，這自然不是無益的事。

左劉二君已能把握這種意義，精細的去讀雜誌上的論文，是非常可喜的事。左劉二君的來信都是爲讀了世界文學第一卷第二號葉青先生的「語文論戰清算」以後而生出了許多懷疑，不恥下問的問到我們了。因爲二君的着重點不在語文論戰的本身，而在葉青先生的方法論，這到使我們更加高興。因爲我們這裏愛談的也多半是方法論這類理論的東西，至於語文論戰呢，我們因爲在戰野中不是什麼戰鬥的角色，不想胡亂開口。

談到葉青先生這篇文章，也許不久要惹出「語」「文」那一方面的人的再戰的，我們也管不了這麼多，說一句不客氣的話，這篇東西並沒有什麼了不起處，至於專談這篇文章所用的方法呢，那確是有興趣而又有重要意義的。葉青先生在這篇文章的末尾上就說「要想問題有正確的解決，在文化上也同政治上一樣，必須於新而高的方法論有充分的

理解，公式的一知半解是無用的。」是的，葉青先生自己的這篇大文，無疑的是在「新而高的方法論有充分的理解」(?)後寫出來的，所以拿這一篇文章中所用的方法論而研究葉青先生的方法論，不能算是斷章取義了。我們很以左君的話爲然，「如果我們弄清楚了這一篇文章中，葉青的方法論是甚麼，他的其他的著作中所用的方法論是什麼，也就知道一個大概。因爲這是葉青先生最近的論文，比較是更可靠的。」好罷！我們接受了左劉二君的質疑，並求教於葉青先生之前。

(二) 內容與形式

左劉二君的疑問，我們現在把它歸納起來：第一點，就是內容與形式問題。左君說：「葉青把文字的內容與形式截然分開來看，是不是犯着形式的看法呢？葉青說過，「在這裏把內容與形式統一起來是不對的」，這我就不懂解。『不錯，這不懂解，豈獨左君嗎？就是記者如果認爲葉青先生是用的「新而高的方法」的，也確同樣是不懂解的。因爲我們對於文字的內容與形式也只能在對立的統一的法則上去理解才有可能。離開內

容談形式是不可能的。我們雖然承認文字是一種工具，但不是說這工具與內容是分開的，無關聯的，而這工具要為內容所決定。反之，這「工具」同時也要影響內容，有時竟會束縛內容。內容自然是「有一定的社會屬性」，而代表什麼意識而言，但在形式上也不能不與它相應。它們同是在一種流動的過程上，變，變。他們永常是對立的但同時又是統一的。這只要用社會學的眼光觀察世界語言進化過程就可得着明證了。如果一定要把它分開，認「文言白話，大衆語只是工具」分別在「容易普遍不容易普遍」，而這又是「工具底社會屬性之所在，一點也用不着內容來顯示它」，這真是主觀的靜態邏輯的看法了。第一，我們要問「容易普遍不容易普遍」果真是僅僅一個形式的問題麼？不見得罷！幾十年前中國就有官話翻譯的聖經了，爲什麼聖經的道理現在並不普遍？這難道不是因爲聖經的內容不是中國大衆所需要的，雖有較易普遍的形式也仍不能普遍嗎？第二，我們要問普遍的要求是從誰人口中喊出來的，如果不是從大多數的人口喊出，這要求不免是一種幻想，如果是大衆提出來的呢？那才合社會的實踐。爲什麼他們要求普

遍呢？他們是多數，他們要求發言了。因此，他們要求着自己羣團的發言工具了。這種發言工具是採着什麼形式呢？自然他們不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仍不能不是既有的工具中生長出來的，發展出來的。一方面是揚棄其舊形式，一方面在創造新形式。這完全是由於這新的要求者代表的意識為內容而決定的。這裏不應該僅僅看做「容易不容易」，這「容易普遍」，雖然是新的語言一個重要條件，但這新形式包括的比這條件要更大，這種新的發言工具還要能有表達大衆的語言最大可能的活潑性，現實性，積極性。一切主張改良白話的人，都只抽象的看到「容易普遍不容易普遍」這一點，忽略了後者。目前提出大衆語，揚棄白話，不僅為白話「不容易普遍」而在白話的社會屬性不是代表大多數的羣團所用的語言的活潑性，現實性，積極性的。至於同時代底社會層，如「五卅以後」的進步的社會層也同樣地使用白話，封建份子用的也不少。「這有甚麼奇怪呢？新的文字不是一天可長成的，反文言的時代，胡適也用文言反文言，現在提倡大衆語的諸先生們也同樣用白話在反對白話了。這雖然是新的內容利用舊形式，但這是新的言語未長

成的過程上必然的現象，不能拿來作爲掩護形式與內容完全無關的，何況，如果更仔細的分析時，現在流行的白話文，也並不能攏統說是一種形式，它有五四時代的老調子，也有帶着日本或歐化氣味很濃厚的腔調，也有近於大衆化的嶄新的文字諸要素。進步的社會層所用的語言，也每每是這舊形式中一種最新的。再說到封建分子用白話的也不少，我不反對，但即令他們的外表上接受了這形式，因爲他們的意識是封建的，所以他們運用這形式也有一定的限度。總不免是一雙解放得不天然腳，眼前的例子就明明白白，當前玩弄白話文的人，不已經有的在文言化，有的在學語錄麼？這不是無緣故的。所以我們把葉先生所舉的這些現象認爲是一種特殊而又偶然的，不是出於他們的本心的。這冒牌貨色，總有一點像劣貨，他自然不能不在某些地方現出原身來。封建份子回到私家的住宅時，還是會焚香唸太上感應篇的呀！

葉先生又說：「如果把內容弄進去，那末問題就多。」那不見得罷？「前進意識中發生了派別時又怎樣呢？」對於「新而高的方法論有充分理解」的人說出這話來，誠有點可惜。

前進意識中發生了派別了，那是沒有問題的，這不過說明這一意識中有的仍在前進，有的敗退了。前進意識仍是一個在活潑潑的前進啊！葉先生難道相信真理同時會有兩個存在嗎？「這種分裂，還不僅一次呢？」是的，如果前進意識就是沒有分裂，這又是形式論者否認了內在的矛盾，把前進意識固定在沒有發展的看法了，自然不會被真正對於「新而高的方法論有充分理解」的人所許可的。

(三) 白話與大眾語的關係

關於白話與大眾語的關係，左劉二君對於葉青先生的「不能同意」，也疑心是在葉青先生所用的方法的問題上，這也是對的。葉先生對於這一問題的理解很明顯的不是把語言發展作爲一個過程而考察的，他把中國語停止在白話的階段，並將它永久化。「白話不徹底，夾雜一些文言是對的」，「反對白話顯然是謬誤」，最好怎樣呢？是把「流行的現成的白話文拿來改善一下」，「使白話文成話」，所以他看不清在現階段上有劃時代的大眾語運動。葉青先生在這里却忘記了「世間沒有永久存在的東西，一切皆流，一切皆

變。」因爲不從過程去理解大衆語問題的提出，因爲把形式與內容截然割開，所以大衆語與白話的關係只看見對立，看不見大衆語是白話的發展，是中國語言的內在的矛盾的長成的結果。自然，他也看不見大衆語的前途，只認作是「標新立異」，「完全是一種名詞的把戲。」

葉先生的了解語言，因爲祇是形式的，所以他會起來替白話辯護，他首先提出「說」
「寫」絕對統一是本來沒有的。白話不能統一「說」，「寫」不能責備白話，大衆語要求「說」
「寫」統一不是幻想嗎？其實這是廢辭，大衆語並不要求說的人開口一定要文法井然，修辭美麗，像文章一樣，大衆語主張「說」「寫」的辭彙語氣統一，是「寫」儘可能的與「說」同一，不用說，大衆語與白話在「寫」出與「說」出的同一上，前者是具有較後者的可能性多，因爲白話本來就不是現實的口語，更不是大多數人的口語的緣故。

第二，他說「大衆底程度太差，在文盲充斥今日，就用大衆語寫，他們也讀不懂」。他這意見是從否認內容決定形式，把形式作孤立而來的。文盲不能讀文字寫的東西是一

件事實，但如果有種大衆語文寫的東西，雖然文盲不能看，若果有人唸給他聽，只要內容與他的生活不很隔離，他依然會懂得，至於白話呢，我們就唸給他聽，他也難聽懂的。這一點，就是大衆要求自己的言語工具，要求白話發展的所在了。至於葉先生提出的第三，「講到政治經濟及其他，就用大衆語說，他們也聽不懂。」這卻不然。這因爲葉先生以爲只有從文字上才可以攝得知識，看不見從實生活上給我們的認識，今日大衆雖不能運用白話，讀政治經濟書，但這些理論他們都容易接受，想來這是葉先生所未夢想得到的罷！可惜，我們現在還有人要反對大衆的語文，要他們在形式上永遠多受一層隔閡，我想，如果將來真的「換了大衆語」，葉先生一定不會作「無濟於事」的興嘆罷！

因此，大衆語與白話的關係，是全語言運動的過程中一個階段，它一面是揚棄白話，自然一面也吸收白話中可作大衆語的要素爲新語言的要素，仍然是從白話出發，所以前途雖然朝着音符化，但目前並不就要倡言一朝廢棄方块字，所謂手頭字，白字等提倡，仍爲必要，是實踐過程中必要的。所以這決不是改良白話的問題，因爲中國語言的

展發是要求既成的言語，意識的使它適合口語，不是把千億萬人的口語置之度外，叫人鸚鵡似的去學習死的語言的呀！因為這是反發展的，我們只應就大多數人的要求來創造新的語文，不應再幻想用「義務教育」來宣傳以前倡導的「國語」了，因為這是無遠大目的運動，是沒有抓住實踐的。

（四）方言土語是封建的產物

葉先生對於方言土語與大眾語的關係，真如左君的懷疑，是「太觀念論」，「太機械論」的。爲什麼是太觀念論太機械論呢？葉先生說：「因爲事實上，只有方言土語而沒有通行全國的大眾語，」不錯，大眾語現在可說剛在創造的途中，可說並沒有現成的貨色，又確確實實在萬億人的口頭上在流轉，大眾語的創造自然不是觀念上的把戲，而是要把這活在萬億人的口頭上活用的言語統一起來，綜合起來，形成一種新語言的發展。中國目前方言土語佔着絕大的勢力，他們都是生活上的語言，是構成統一大眾的原料，却不就是大眾語。大眾語運動不忽視方言土語，並且主張多元的發展方言土語，是握住這

一運動現階段的一環，是合於邏輯的。但大眾語運動決不就是方言土語運動，以發展方言土語爲滿足，爲最高目的。這里又是要運用對立統一的法則了。發展方言土語同時就是要消滅方言土語。方言土語文學的提出不僅不是「錯誤」，而且是需要的。不錯，方言土語的社會基礎不免是封建的，同時是一種語言上的割據。站在大眾語主張的人是承認要消滅它的，可是要消滅它却不是僅僅用「左的辭句」，空空地說幾句話就做得到的。我們先得造成消滅它的條件。但這裏又不能用機械的觀點去作抽象說明。這要先得把握住中國民族解放（它包括國民經濟及社會改造）根本問題，大眾語完成的過程無疑的與中國民族解放過程相適應的。但也不是等待中國民族解放完成了，大眾語就會天然的成長起來。這是要作一種意識的促成運動，使語言自然發展的過程縮短。同時，這種意識的運動，本身又是促成民族解放主體的。因着現在有了這一主體作爲中國文化的背景了，在語言方面，動向是要求大眾化，實踐呢？是通過各種方言土語，用同一的實踐內容，使各種的地方的形式漸漸融和而成一種豐富的共通體。所以，方言的封建性，同時在今日

又可利用它作反封建的工具，利用今日的方言土語，不是維持封建的割據，而恰相反，正是揚棄封建性，造成語言的統一。葉先生明明犯了觀念論的，機械主義的錯誤。

(五)大衆語的音符

語言進到音符是一種必然的階段。左君似乎還不很了解。葉先生「以爲漢字改革是必然」的，總算是他在這一篇文章中最進步的說話。關於這一點，我在本文第三段已略略提過了。中國語進化成一種什麼樣的音符是一個問題，但朝着音符化是必然的。目前提出甚麼化也不僅不能認爲空想而是必要的。因爲語言在今日也再不能聽其自然發展了。葉先生否認拉丁化土語文字，是由於根本否認土語而來的，更深一層說是由於否認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這一點而來的，所以葉先生對於這一段的分析，也不免是觀念上的一種遊戲。

(六)總括

因爲我們是討論葉先生的方法論，所以我們的話也祇想止於方法方面，關於葉先生

那篇大文各個方面却不想更詳細的談了。至於結論呢？那是他的方法論必然達到的結果，是一點也不足怪異。我們自然不能同意的。因為我們不是要替大眾語來辯護，所以也似乎沒有加以批評的必要。我想，還是讓語文雙方陣綫上的人們去再「清算」去罷！我們書癡子暫時就談談葉先生在那篇文章中所用的方法論爲止，以免見笑文語雙方的「方家」罷！

最後，我很負責的告訴左劉二君的是「新而高的方法論」在葉先生的文章內是沒有的。

李權時所處理的實際問題

——對李權時的「中日經濟提攜運動我見」之批判致答陸伯淵
君——

(一)

「關於中日經濟提攜確又是一種時論了。但它比「敵乎友乎」不同些，因為提出這問題的人是日本，但也並不是正式向中國官方提出的，起初還不過是放一種空氣，所謂中日經濟提攜的大綱最初見於上月十三日電通社露佈的消息。在日本的輿論方面，雖然有許多捧場的意見，但發言都謹慎得很，因為這種消息起初還只能作為一種試探中國政府人民，和國際間，尤其英美的態度之用的，將來實施時，到底怎樣，還不能就說確定。

至於在中國方面呢？雖然這是一種空氣，却不能不特別加以注意，如果它是危害中國國民經濟及主權，那怕它是空氣，也不該讓它在國際間存在，不然就有失我國國體。

不過，在發表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前，我們却應該特別慎重，其慎重的限度，我想，比起日本輿論所持的態度來還應嚴緊些。我們應該深沉的去研究它，却不該浮燥的輕於說話，尤其是「領導中國國民經濟的銀行界的機關報」，不應輕於登載對這一問題沒有深刻認識的文字；尤其是捧場的文字！一個幾乎有了二十種大小著作的「經濟學家」（？）在發表文章前，最低的限度不應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自己以外還有大眾，自己死後還有子孫，一句話說完，總要說出來的話不像日本的臣僕說的纔好。不然，就會使人懷疑這篇文章是一篇譯稿，是日本人寫的。

可惜得很，對於這樣一個嚴重問題，雖然在國內刊物上大致也都提起了，但代表中國銀行界喉舌的「銀行週報」在第十九卷第七期中日經濟提攜討論專號內却登載了有二

十種大小著作」的「經濟學家」，李權時的「中日經濟提攜運動我見」的大文，這真使我大吃一驚，我幾乎疑心這本雜誌是在東京出版的。

但爲了忠實的想了解這一問題起見，所以我壓下一時的憤激，平心靜氣的來向先生們請教。我第一不知道李先生這篇大文是否代表中國銀行界整個意見，如果是的，這是不是可以說，這是殖民地的「金融資本」必然的結論呢？第二，我想先生對於李先生的謬誤深刻給與批判，使我和我以外廣大的大眾，不致會被他那番話騙過。第三，從李權時這種處理實際問題，我想到他的經濟學說了，我要求先生們指示出這謬誤的根源來；即對他的學說，下一個概括的結論，使千百大學經濟學系的同學抱着他的「經濟學原理」執迷不誤的人，因此打開眼睛罷！」

以上陸君來信的摘要。

這裏我們要說，陸君這封來信，有點出了我們意料以外，因爲陸君方不過是一個平常大學的二年級學生，他能這般的注意當前的實踐問題，而又有以上那樣正確的見解，

豐富的熱情，冷靜而又謙虛的態度，以及把理論與實踐融成一體的作學問的方法，這一切都使我們對他十分敬意，同時也使我們對於今日的大學生雖說像陸君這樣的人真是鳳毛麟角的，也還覺得有一些兒希望，因此，也就樂得來同陸君討論各項問題了。

(一)

關於中日經濟提攜這一問題，在本刊上一期（第九期）本欄內有一篇答吳致和君的通信，在原則上，要算發表過我們的意見了。不過，在吳君那封通信的時候，國內對這一問題發表的意見還不多，並且還沒有看到銀行週報李權時先生那樣重要文章。所以在那封回信中，只說自己的見解，沒有提到別人的意見，至於陸君看到李先生的文章覺得駭怪的，我們也幾乎有着同感，不應該看完了，不加以一點自己的意見。至於這篇文章是否代表中國銀行界的意見呢？這可不是我們敢於隨便妄斷的。不過，既然能登在銀行週報上，多少是很有代表言論的嫌疑的，這一個疑問，我想暫時還是存疑，讓銀行界以後發表的意見去定奪罷！

這一意見所代表的意義是否有點殖民地民族資產者的味道，我們的感覺也有些同調，不過這倒不是本問題最重要的部分，不去詳談它，現在且來檢查李權時先生的高論罷！

（三）

先看李先生的對於經濟提攜的解釋。

李先生把國際經濟合作分爲三種：（一）國際經濟分工，（二）國際經濟提攜，和（三）國際經濟集團式同盟。關於第一種，就是今日世界經濟的相互關係，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發展到世界經濟的階段必然的事實，這種關係有的是根據於地理的不同，有的由經濟發展的階段的不同而產生的。這種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互助，自然沒有加以反對的理由，也不是隨便可以由你加以迎拒的。這種廣泛的話，實在與所謂中日經濟提攜是風馬牛不相及。第二種國際經濟提攜的意義不甚明顯，大概是指甲乙乙二平等國家間，在經濟上有着共同利害的一種結合，其性質大概也是偏於一時的。中日經濟既然發展得不平

衡，自然說不上。第三種，也就是李先生所謂「其意義最爲狹窄，其範圍最爲局部」的，大概是指出一首腦國爲主體，而領導一羣衛星（殖民地）的所謂布洛克經濟罷！不過，李先生故意說得不明不白，使人不明真相，這種布洛克的結合，中國誠然有資格，卽作爲這種經濟主體的一種補充，其結合不是純經濟的，它是運用暴力結成的，這裏談不上什麼「平等，互惠，獨立，自尊」的鬼話，乾乾脆脆是做殖民地。日本提出的中日經濟提攜的基礎，明明是把中國從半殖民地變爲完全殖民地，在日本布洛克經濟體系內構成一份子。我們在上一次答吳君信中已經就說過了。

李先生這一段話誠像陸君說的是「放了一種煙幕」，「讀了李先生這段大文的人不覺就有點昏昏然了」。然而，書歸正傳，現在且來看看這位著了二十部大著的經濟學者對於中日經濟提攜大綱那六條的認識罷！

李先生對於第一條日本擬由民間組織中國實業視察團是「吾人將一本修睦精神以待之」。這一句話，初看起來好像沒有毛病，但經不起細玩。這就是李先生把這視察團

所負的使命，及其侵略的重要性抽去了，不然的話，誠如陸君所說，這「修睦精神」不知從何說起。我們知道，這種視察團與美國派往蘇聯，蘇聯派往英國等是完全不同的，這裏不能將它混同。

李先生對於第二條中國應先重定經濟政策，只認為「其意義甚為含混」，不覺得這話不應該由日本人說。它對中國是一種侮辱。中國的經濟政策，照理只應由中國去定，用不着鄰家來代謀，代謀已經糟糕，然而還要弄出中國人去揣測自己應建立的經濟政策，這真是在鬧天大的笑話。鄰家要我們建立什麼政策呢？「似欲採行重農政策」，並且據說，這已經是國貨，「吾國金融家」早已有所主張矣」。這是什麼話，即就重農政策說，這已是腐朽之論。中國目前要求的明明是國民經濟的解放；中國生產方法現代化。我們要振興農業，但不是採什麼「重農政策」，而應是將封建性的目前農業生產方法與關係，飛躍達到最進步的新農業形式的前途去。這就得在國民經濟改造中，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先應佔更大的比重，先造出農業發展的條件才行，不是單獨提出重農政策，

我們應當知道，沒有工業，也就沒有農業，否則就是無意自甘於殖民地經濟性質的保持。再不然，就是一句不懂經濟學的人的笑話。

關於第三條中國應改革米麥糧食品輸入之變態的現狀，誠然不錯，但改革的進程決不是先於農業技術方面，要技術改良，上面已經說過，要自己有相當發展的工業作前提，纔有可能，至於與帝國主義國家謀技術合作，那完全是夢想。技術合作四個字不過是一個煙幕彈，它只有和緩國民的情緒，擾亂國民的視聽的作用，用它掩護帝國主義者對於農村更進一步的侵略，對於中國農業經濟不會有好處。不僅如此，甚至「借重客卿」要想不「喧賓奪主」亦都會談不到。這不要說半殖民的國家無此抵抗力，就是蘇聯那樣頑強的國家當其進行經濟復興中，亦曾放棄利用外資的政策，也不能隨便的與人「技術合作」，「借重客卿」，否則就會「喧賓奪主」無疑。是的，在自己經濟力，政治力都有支持自己的經濟政策的力量了，在某種有利於己的條件下，利用外國進步的技術和專家都屬應該，但這談何容易，人家實行一個五年計劃後，才培植了這一種條件呀！然而，在

那樣鐵掌中，那些「客卿」，還要參加實業黨，暗殺黨等的陰謀，弄得幾乎把已成功的經濟建設都破壞。這不是人家的榜樣就在眼前嗎？

第四條，以「促進中國生產大宗農產物，以便日本工業之應用」，李先生認爲是「合理的斬望」這一點，前面已經批評過了，這是自甘於殖民地經濟性的人的斬望，李先生有點像同他的善鄰在唱雙簧，一言一語，都好像是先套過板的。他把中日的將來關係比作英美，是何等不倫不類的比例，英美的關係，在美國方面果真只是生產了大宗的農產物以便英國工業之應用嗎？我想，李先生雖欲自圓其說，恐怕沒有那樣的膽子來否認美國不是高度的工業國罷！美國有多餘的農產物供他之用，故然是事實，這一方面是美國天然經濟力比任何國厚，但最主要的是美國有了高度發展的工業，才能有高度農業技術，高度的農業生產呀！他賣農產品與任何國家不過是一種單純的經濟行爲，不會有什麼條件的呀！李先生，你雖欲掩蔽事實，恐怕你再寫二十本「名著」也還不能說服天下人罷！

至於第五條明明是日本要統治中國棉花生產，消滅中國方興的紡織業，抵制印棉兩種作用上。李先生是「極端贊成」，因為有了三千萬華棉出口，吾國對外貿易出超可以減少，白銀流出的威脅亦得減輕了。這誠然是經濟家的話，他的腦子裏的算盤上那裏能忘了這三千萬的銀子呢？可惜的是他忘了目前中國紡織業自己還在購外棉，近年來初培植的一點國棉生產，還不夠自己之用，他卻替日本紡織業担起心來，這是何等的善鄰啊！但是，這三千萬生意也不容易兜着呀！條件是要「澈底取締排日貨運動」。李先生却一口答應了「自動的」來掃除。這真使我們不測高深了。若說東北四省亡了，李先生已不能記憶，我們無甚駭異，因為一個專家，不免有時眼睛只能射在「專業」上，是不大以管天下大事的，但李先生是經濟學者，他不應忘記，在今日，抵貨有助長國貨生長的作用，日貨傾銷的結果是國產的淪亡，破滅等等，這在經濟學上，即合是流俗的經濟學原理的A B C上，都是說過的，李先生能否認嗎？

最後，第六條，日本擬在上海設立二萬萬元之信用基金，李先生也歡迎，是的，日

本人說的，李先生總歡迎，這一點也正如陸君所說「這是日本謀在中國金融統治的開始，想在上海先取得匯豐的地位」。不獨中國國民經濟更淪為日本銀行倉庫中物，亦將引起英美戰爭。李先生眼睛只放在「此鉅額的信用」上，他忘了就是流俗經濟學上也是承認的，今日金融資本統治產業這一事實。日本金融統治了上海，中國產業還有希望嗎？就退一步，讓日本來統治，英美也不說話，中國金融也不見穩定，國際間的貿易也不見得能圓滑，何以故，因為日本所謂二萬萬的信用是說大話，日本除舉空頭支票外，是不會拿出二萬萬現銀來，因為他的國庫存銀的底子就不過四萬萬幾千萬。他拿不出這麼多白銀來呀！

總之，李先生這篇大文要引起國人的懷疑憤怒是必然的；所謂「知己知彼，能屈能伸」，李先生真正做到的恐怕只可說「能屈」能屈第三個還是「能屈」罷！我們看不見「能伸」的是什麼。

(四)

至於從李先生這一個處理實際問題的輝煌的例子去回顧李先生之經濟學說，在一個正在讀李先生經濟學原論的人，是非常的必要的。因為這正是他的學說的應用方面，一點也不容他自己去掩蓋他的。陸君並懷着去考察他的二十部大小著作的志願，雖然在陸君讀完他那些東西後，不免會感覺得時間是白花費，但爲了使世人認識李權時先生的經濟學說，那到不是完全無益的事。

這裏因爲限於篇幅，不能將李先生的學說作詳細檢討，姑且略爲替他作一點提示罷！

李權時是一位「博士」，他的著作中文的有十六種，英文的有三種，散見雜誌上的還不在內。其中「經濟學原論」是最重要的一本，復旦大學叢書之一，是今日中國許多大學採爲教本的。其他還有幾種A B C的通俗小冊子，也傳得頗廣。他是中國經濟學社的主幹，編輯「經濟學季刊」，在今日的中國，有人稱他作「大經濟學家」。

他的學說的內容，大致是由所謂「勞力價值論，經濟心理學，經濟論理學，相對均

「產主義論」所構成，實則並無一貫之系統可言，有人說它是一種「雜炊」式的，倒很相像。不過，他很會舞文弄墨，「巧言代辯」的，他的學說的來源是什麼呢？是一方面襲取了歐美流俗經濟學者，特別是搬運了美國教授們流俗之見作為他的學說的基礎，一方面融會了中國流俗經濟學者馬寅初等的理論與古先聖賢的傳說的腐爛的學說，裝飾了成爲「國貨」。

他的方法論呢？自然不是科學的，是十足的混亂的玄學法。他在經濟學原論中，是用了簡單的，落後的演釋法，和歸納法，把消費，生產，交易，分配等無次序的說了一大通，把書寫得厚厚的就算大著了。

所以，他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他就可以作為新興的中國產業階級的辯護人而出現，但是到了今日，他又幾乎成了日本的代言者。這都與他的學說中，美國式的實利主義的流俗之見的要素有關，使他的眼睛只看到目前的現象的表面，忘了有中國，同時也與中國固有傳統的要素有關係，弄得他只會翻古，唱什麼「重農」的老腐調子。結果，他的

學說變成了非民族的流俗論了。它成功了殖民地的流俗經濟學。

於對他學說詳細的批判，以後遇有機會時，再談罷！

阿Q的精神勝利

——答方濂塵並批判吳景超「自信心的根據」——

『好久以前就在大公報星期論文內讀到一篇叫做「自信心的根據」的妙文了。作者是吳景超先生。說一句老實話，我對這種東西是不大重視的，這猶如我對這一欄其他文字一樣，瀏覽過就算了。至於瀏覽的心情也不過想知道一點所謂「學者名流」的「高深」而已。

不想，我在同學間竟又聽見有人在那裏引用這位吳先生的話，而且好像大家都覺得有了一種新的希望，中華民族的自信心的根據，這一回真的被吳先生找回了，中國也因此得救了似的。在北方今日這樣嚴肅沉默的空氣下，在萬分屈辱與羞愧之餘，居然大家放出了笑顏，彼此無形的在那裏慶幸什麼，這不能不令我吃驚了。

是的，這篇東西仍有影響人的力量！尤其在今日有一種使人忘記屈辱，羞愧，而自甘於滿足的阿Q的精神作用。由此，我想到以前對於許多名人的時論，抱着隨便瀏覽，不關心的態度，有點姑容謬誤的存在的罪過，很不自安。所以再從報紙堆裏檢出這篇文章來讀一遍，我看見了阿Q的面貌，但是也覺得這位吳先生狡猾得很，他的話總帶着「似是」的面貌，要對付他到不是很容易的。因此，我覺得實在自己先還有加以一番研究的必要，然後才能有力的批判的說服別人。

現在將吳先生的文章主要的兩段，剪貼於後：

「第一，中華民族適應自然環境的力量，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黑人在熱帶中很服水土，但到溫帶或寒帶中，死亡率便加增起來了。白人與黑人恰好相反，他們在熱帶中過日子是不大過得來的。印度的英人，南洋羣島的荷人，每隔幾年，便要回家休息一次，否則健康上便發生危險。我們中國人便不然，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成家立業。若下年前，伍廷芳公使曾向美國人說：中國人服水土的本領最大，白熊住的地方，中國人

可以去；產生鱸魚的區域，中國人也可以去。這決不是誇大，只看中國僑民的分佈，便可知這合乎事實的。中國人既有這種力量，所以在生存競爭上，不但是不會被淘汰的，而且向各處發展的潛勢力，也是很大的。

第二，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與任何民族比較都無愧色，這也有好些事實可以證明的。根據倫敦大學 靳世保教授 (Ginsber) 所引的統計，歐洲人頭顱的平均容量，男子爲一，四五〇立方厘米，(Cubic centimeter) 女子爲一，三〇〇立方厘米。中國人頭顱的平均容量，爲一，四五六立方厘米。如與德人比較，德人頭顱的平均容量，在一，二〇〇立方厘米以下的，佔百分之八，中國人只有百分之二。在，三〇〇立方厘米以上的，德人有百分之七五，中國人有百分之九二。再拿腦的重量來說，根據託比蘭 (Topinard) 的研究，歐人平均爲一，三六一克，(Oramme) 中國人爲一，四二八克，此處我們要替歐人說一句話，就是歐人腦重的平均數，是根據一萬以上的個案而得到的，中國人的平均數，只根據少數個案，根據太小，也許不能目爲定論。不過我們可以說的，就是現在

的研究，證明我們的腦經，是並不弱於白人的。最後，我們再看智慧測量的成績，雖然歐美有許多學者，舉出許多研究，證明黑人的成績，遠在白人之下，但他們並不能舉出統計來，證明中國人不如白人。隔斯(Garth)先生，在他的種族心理學中說，白人的平均「智慧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爲一百，中國人與日本人爲九九，黑人爲七五。所以即如此公所說，白人與中國人的智慧，相差也不過毫釐之間。此外還有人證明中國人的智慧商數，在白人之上的，如古得益諾佛，(Goodenough)根據他的研究，謂中國人的平均智慧商數在一〇四左右，聖帝弗(Sanford)研究加拿大華僑的兒童，說中國男孩的智慧商數爲一〇七·七，女孩智慧商數爲一〇七·〇遠在西方兒童平均智慧商數上。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中華民族的智慧，在世界的各色民族中，是位居前列的。最後，我歸納了我的疑點於後，希望先生能作科學的通俗的解說。

「個人的自信心與民族的自信心到底應根據什麼？中國人服水土的本領最大，是否即可說是適應自然環境的力量最大？頭顱的容量，腦的重量，及智慧商數的優越，是否

可舉來作自信心的根據」

——方滌塵於北平

對於吳景超先生那篇文章，如果是稍微有點科學頭腦的人，卽令是隨便瀏覽一遍，雖然吳先生引用下許多科學數字，裝飾得很科學似的，那也完全無用，其不科學處，馬上就可以使人感到。方君讀後所感，以及對於時論的態度，對自己研究心的緊嚴，對謬誤疾惡如仇的心理等等，我們都完全同意和欽敬。不過，爲了節省字數計，這一切都想從省少說。

在批判吳先生的「高論」和答覆方君提出的各點以前，我們對於所謂自信心三個字却不得不先加以一點解釋。

什麼叫做自信心呢？

這三個字被常識的濫用得太廣了。我們常聽見人說，某甲自信心很強，卽指主觀見地強，或帶有一點高傲，頑固之意。某乙一點自信心也沒有了。卽指其人屈伏環境，沒

有主見，小視主觀力，略帶怯懦萎靡之意。就一個民族說，例如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把自己看做是天國，人家都是夷狄，這是充分表示了民族自信力的，現在呢？人家隨便放一個屁，有些人也不敢不聽命唯謹，無論人家如何欺凌，連反抗的心理也沒有了。這大概可以說是民族失了自信力。通常一般人總對有自信心的人表示欽佩，對失了自信心的表示輕蔑，對一個民族也一樣。如像一個個人的成功或失敗，完全是在有不自信心，意志以戰勝一切，支配一切。

自信心是這般可貴麼？有了一個這樣的心，就可以為所欲為，成所欲成麼？並不如此。這種常識的說法，完全是觀念論的。一個個人如果自信心誇大而沒有正確的認識客觀的現實，他的自信心不過變為誇大狂，頑固，玄想，幻夢，他並不能成就什麼。

反之，一個個人，如果把客觀的現實誇大以為祇要有了好的環境，什麼事都自然會成功的，他完全否認了主觀能動的力量，他不能把一切的可能性把握住，將它變為現實

性，必然性，結果無非讓一切良好的機會跑掉，他仍會一無所成的。

這些都是形式邏輯必然達到的結果。

自信心要在什麼條件下，才是正確的了解呢？

它要是正確的把握住客觀實踐當前的一環，同時不是客觀的宿命論者，而不忽視主觀的能動的作用，主觀力有推移變化客觀的作用，但主觀的力却有一定的限制，他不能越過客觀的實踐所許可的條件以外。

因此我們不反對一個個人有自信心，但反對把這自信心過為誇大變為誇大狂，頑固，妄想，幻夢。同時我們也反對客觀主義者，失了生存奮鬥的熱力的頹廢者。

在生存奮鬥中的勝利者，絕對是有自信心的人，但一定是正確認識客觀存在的人。那麼，這一自信心的根據是什麼呢？

是認識，不是由於生理的先天的條件。

一個民族，尤其是帝國主義階段的弱小民族，要想爭得自己的生存的權利，要想獲

得解放，自然不能不有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的自信心，在這裏，大概可以解作民族的自覺心，民族的意識，或民族的意志，不是民族的誇大，像中國過去一樣。

這種民族自信心應如何獲得呢？這無疑的也是從民族所處的地位的客觀的實踐，這裏包含着社會發展的階段，及當前世界變動中的條件，從這實踐中去把握一切利於自己存在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並創造一切可能性，創造下一環子的順利發展的條件。這裏依然是認識客觀，和能動的運用主觀的力。從此認識中凝結民族的意志，意識，發展而為民族的自信心。

同樣這一自信心的根據，不是由於民族生理上的，或先天的優越性。

既然如此，那末，對於吳先生以生理的立場，去解釋自信心的不正確，也就幾乎不待辯白了。

然而，正如方君所說的吳先生的說法也是很狡猾的。天下真正的謬誤，自然它也不見得就不能幻作似是而非的「真理」。所以，吳先生的高論，到還不能就是這樣放手。

吳先生認爲中華民族自信心的根據的第一點，是「中華民族適應自然環境的力量是任何民族所不及」。怎麼不及呢？據說是「中國人服水土的本領大，」無論寒溫熱帶中國人都可「成家立業」，可惜的是吳先生把適應自然僅僅解作動物性被動的適應，是這樣淺薄的。人類適應自然不要忘了是改變自然，克服自然啊！如果把它所作是中國人制御自來的力量大，那就應該拿中華民族目前社會的生產力去做標尺，木犁，手車，耕牛，天然肥料這一切是足傲誰人呢？

哈哈，中國人有一種受苦的「天性」。「印度的英人南洋羣島的荷人每隔幾年要回家休息一次」，那是因爲他們是殖民地的主人。他們有安樂的家可歸，中國的僑民要老死干「白熊鱷魚之鄉」，中國人是在做苦力，他們從飢餓的故鄉，無法生存的祖國逃出，他們「遠適異域」，何嘗「健康上不發生危險」，但是不能不求生存，只得把八十斤肉去冒嚴寒酷熱呀！這種本領是不值得作爲民族的自信心的。至於說有了這種力量就不會被淘汰，這真是閉煞眼睛在說鬼，年來僑胞不是一批批送回國，被殘殺，驅逐麼？各地僑胞

的生存不是都到不能保了麼？那八十斤鐵骨還不是完全未改變麼？

這是何等的謊言啊！

吳先生第二個證據，是說我們生來有一個好的腦袋，這已夠無聊了。何況這種統計就是吳生生也自認是「此處我們要替歐人說一句，就是歐人腦重平均數是根據一萬以上的個案而得到的。中國人的平均數，只根據少數個案，樣本太小，也許不能目爲定論」呢？這明明是無價值的。卽退一萬步說，我們天幸生了這樣一個腦袋，可是，我們的生

活，現在處在這可悲的現狀下，我們生存救死方不暇，我們優越的智慧，大好的頭腦能有什麼用處。我們的智慧能發揮出來嗎？

可惜，吳先生看不到，這好的頭顱現在正在被其他「劣等」民族所殘殺，被水旱天災人禍所毀滅！一味的誇示自己的皮肉，以求精神上的慰安，這真如方君所言，是阿Q的精神勝利，這足以構成民族自信心的根據嗎？

如果說，我們民族有了這種特質，就可以發生自信，因此也可以發生民族的力量，

我真不知這話是如何說的。

總之，這是完全的說謊。這種破落貴族式的誇耀自己血管裏有尊貴的血液是可恥的。在今日民族的屈辱中，竟有這種妖言，我不知是無知，還是有意識的在混亂國人民族意識正確的發展。是的，這是應該迎頭痛擊的。

自信心的根據是什麼呢？是正確的科學的認識，把握當前的實踐，改進自己生存的條件，發展自己民族的生存。

七分經濟三分文化嗎？

——答伍潤蓮君——

『最近大公報「社評」提出了一篇關於「救國大計之商權」的文章，主張用「七分經濟三分文化」來挽救中國。

現在中國民族的危機，真是到了「國破家亡」的現象了。說到救國，總沒有人反對這是多事罷！但如何救法呢？這問題實在老早就提出來了，答案也就多得很，不過，所謂用「七分經濟三分文化」之說，到今日止，確是聞所未聞的。

是的，「救國大計」是應該大家來「商權」的。一人的思慮有限，一部分人或一個特殊社會層的人的看法也未必就一定周到。這是一個大多數人求生存的問題，所以應該很普遍的在各級人民中活潑的討論，各人的意見不必盡同，儘可就其所見，公開於世，讓人

家來批評或擁護。好在真理只有一個，真理的獲得是在爭辯中，真金不怕火燒，代表真理的意見自然不怕人反駁，她不會因人聲沸沸而失去其意義的。

「七分經濟三分文化」的救國論，既然是一種新的意見，作者又用了「商榷」的態度，在作者方面自然是希望有人來注意這種意見，在讀者的我們，對這一種新的意見出現，也應該不管是真理或謬誤，一樣用着公正的科學的態度去加一番考察，正確的給它一個批判，如果是真理，就應讓它發揚，展開，如果是謬誤就應早些使它歸天，不要讓它流傳惑世。

淺學的我，在讀完這篇大文後，作何感想呢？

首先我覺得這與現在高唱着的外國與中國經濟提攜文化合作的聲浪有些關係，不是什麼出自胸臆的高見，並且我感着一種說不出的不快，好像這樣的主張，失掉了民族獨立性了似的。

我爲了認識真理，我壓下一時感情的惱怒，我仔細地來研究這篇文章中所含的真實

和僞謬。

第一，我認爲「七分經濟三分文化」的救國論仍然不過是「經濟救國論」的老調了，雖然他把文化連在一起，又是文化不過佔三分，經濟總是主體的了。

第二，經濟救國論，政治救國論，文化救國論，教育救國論，道德救國論，航空救國論，都是對中國的病開的一個方子，自然都包含有些真理，但都只把握住一部份，即只看到樹，沒有看見樹林的全體，經濟救國，即令果然是一個好方子，因爲中國的病症複雜，也不見得能奏神效。

第三，我覺得這仍是一服「神藥」，是抽象的，玄想的，不能有現實性。

以上是我的讀後感，不知對與不對？請你們給我一個正確的解答；並將大公報社論一紙剪貼如後。』

——伍潤蓮來信，「社論」從略

我們對於伍君要求認識真理的態度，以及他對於「七分經濟三分文化」的救國論的大

概認識，我們認爲都很不錯，不過，同時也還覺得伍君指出的還很不足，伍君的話祇是消極的「破」，却沒有積極的「立」，就是「破」的方面，也還沒有把那篇文章漏洞具體的指出，還不免空洞擁統之感。這樣自然還不能說服該文作者，及代表這一類意見的人了。這篇文章與目下外國和中國經濟提攜文化合作的聲浪有關，我們完全同意，就是該文作者自己也承認了的。這種議論發生在目前的中國，自然不是偶然，尤其是因爲如此，對於這種意見，實在不應輕輕讓它放過。

「七分經濟三分文化」是對於所謂「救國大計」的提案，也就是所謂「救國大計」的內容了。但是在檢討這一對策是否正確以前，我們先要問問什麼是「救國大計」。

首先應該把中國總的形勢有一個客觀的正確的估計。認清自己的地位，危險的程度到怎樣，知道自己的地位了，然後才可以言救，如何救法。這說來慚愧，中國人知道要救國，高喊救國已經是幾十年了，理應對於中國的總的形勢，救國的總的目標，早該認清和確立了。隨着危機的進展，國策自然也應與之相對，在總的方面却並不是時時要

更改，它有一定的固定性。但爲了達到總的目標，在實現的過程中，每一環有每一環的實踐，和具體的方略，這是一定的。忠於謀國者，他應能看見大者遠者，我們奮鬥的目標，但同時，他也能看見當前在演變中的現實，並不畏懼，慌張去打開當前的難關。這時，在總的原則上無變動，探討和執行者，祇不過具體的對策，合於這一階段，能打擊敵人，有利于己的實際的辦法。不是事到臨頭專講原則，把總的目標，和某一階段的戰術混同起來。

中國的救國大計，在總的方面是要求民族的獨立解放。它的內容是包括政治的獨立，國民經濟的解放與發展，如何使這一內容變爲實踐呢？要達到這目標是反帝反國內經濟的落後性，及落後的生產關係的束縛。救國大計在總的方面不能離開這目標的，失了這意義，在枝枝節節上兜圈子，那是口頭救國論者，抽象的玩弄辭句的騙子。

至於最當前的戰略呢？那祇有從這一總的前提下，再根據當前客觀的現實，定下戰鬥的方略。不能專說原則的話，要說出就能行，行可以使形勢改變，適合於自己的生

存。

這是我們對於救國大計在原則上要認清的前提。

拿了這原則來看所謂「七分經濟三分文化」論，那就失望得很，這種文章仍然是把總的目標，當前方略混合起來，使人覺得「是是非非」，令你摸不清頭緒。

不錯，救國就是爲了求民族的生存。求生存的中心關鍵在經濟的解放與改造。這原

是千真萬確，但是如何才能達到經濟的解放與改造呢？

這要先求得這種解放的先決條件。就是先要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和肅清國內代表落後生產關係的殘餘勢力。這就是先要有起碼的政治解放與獨立。「救國大計」主要根據在經濟是不錯的，但決不是「姑置政治關係問題於考慮之外」。所謂「七分經濟三分文化」，那實在與當前短視的經濟改良家，想用醫頭醫腳的方法挽救中國危亡一樣，是向在那裏說夢話。

我們請問，這「七分經濟」從何做起呢？所謂「前與資本主義經濟追逐，後與社會主

義經濟抗衡，能使生產向上，民生日裕之經濟」從何達到？我們有這種條件麼？帝國主義准許我們的經濟這樣飛速的發展麼？

明顯的，這祇能認作是我們解放運動總目標內的中心關鍵，不是當前急迫的救國大計。

當前是要爭求這種解放的條件。

這裏應具體的指出，眼前我們要在這總的目標下，最先爭得領土的完整，國防的牢固，文化的獨立。在經濟方面，自然也應加強自己的抵抗力，不過，這一階段，一切都是政治的。現在無論談到領土，文化，或經濟的自衛力等都非與敵人作殊死戰不成，不論在外表上現出是外交的，經濟的，文化的，骨子內都是政治的，軍事的。如果連這些前提都不存在，在這樣危急存亡之秋，來高唱幾分經濟幾分文化這不是迴避實踐，玩弄實踐麼？

這有什麼實際的效用？

再就文化來說，文化二字本來應解作代表人類各方面生活的總稱，人類勞動所創造一切事物的綜合。中國文化就是具有中國民族特殊性的生活的綜合的意思。不要單看做是指學術思想。一國文化的進步或停滯，就是這一國民各方面生活向上或落後，尤其是成爲國民最基本生活的經濟生活向上或落後。中國文化當前不及別人，我們不必諱言，這祇要回顧自己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就明白得很。文化的建設是急務，但不能不顧到這建築的基礎。文化建設也要先爭得文化建設可能的一切條件。

所以，「救國大計」在總的原則上是以經濟作中心，同時也可以說是以文化作中心。這裏把它分作幾分之幾的經濟，幾分之幾的文化，完全是不明白文化是什麼的一種形式論理的看法。實際這不獨不能把它分成幾分之幾，連二者也是分不開的。要發展經濟才有文化可言，爲了文化的進展，就得發展經濟。

但我並不否認成爲「各方面生活」之一部份的社會意識，或學術思想對於當前民族的抗爭上有着戰鬥的作用。但不能像這位社評作者一樣只抽象的提出「文化」來，並且分量

還祇「三分」。

在一般習用上，一國有一國的所謂文化陣綫，在今日中國民族眼前與民族敵人的對立的壁壘，雖然在總的方面是政治的，但這「政治的」自然是由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一種統一和綜合。如果分開來說，中國文化陣綫，在民族與民族敵人抗爭時，自然是配合着政治動員的，並且它有着相當的決定的作用。

可惜，那位社評作者實在不足以語此。

總之，這篇文章與當前救國之道無關，不過是因着別人在那裏要與中國作經濟的提攜（實在是侵略）文化的合作（實在是征服）而有意無意的在那裏唱雙簧罷了。它是沒有積極的效用的，但有壞的影響，因為它有提高別人的調子，在這「七分」「三分」的斤兩中斷送掉中國的「經濟」與「文化」。

這就算對於這篇「社論」的批評罷！

仇君！你提出的三項意見，以上的話也可以說是答復你了。不過，最後我覺得還要

加幾句蛇足。

你的看法，大概是對的，但還覺得不精細，也嫌有些攙統。譬如你說：「經濟救國論，政治救國論……航空救國論都是對中國的病症開的一個方子，自然都包含有些真理」，這固然不錯，但是你沒有指出那一個包含真理最多，那一個是主導的。你又說：「經濟救國即令果然是一個好方子，因為中國的病症複雜也不見得能奏神效」，這裏十分不明白，這一點我在前文中說得很多，這也不多說了。請你自己去體會罷！

真的，我們希望這種「商權」能夠擴大開來，成為廣大人羣間的互相辯論的問題。

投河殉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答江敬棠君——

編者先生：

我最近很被報上的一段新聞感動了。我認爲在今日全國人民均沉於醉生夢死，不敢談國事，不願談國事的空氣下，能有一個這樣的人，爲了亡國之禍，甘願投河殉國，這是十分難得的，但是報紙上，也只有作一則普通自殺的新聞，排在不大令人注意的報幅上，我是何等的憤慨啊！難道這種忠義之氣在今日就不值得一提倡麼？現在先將這則新聞照錄於后：

(甯夏通信)本省甯朔縣縣長牟鳳鳴，早年服務甘肅教育界，頗負時譽。旋以矢志革命，北伐軍興，遂投筆從戎，備著助勞。比年以來，痛心國難，深受刺激，時與人慨談

國事，輒高歌岳武穆滿江紅詞，聲淚俱下。今歲奉命出長甯朔，甫經半載，而勤政愛民，成績卓著。近以時局日非，竟憤不欲生，遂絕食數日，復於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投入縣府附近惠農渠中，幸爲公役所見，竭力營救，始慶更生。省府馬主席聞訊，殊爲感動，特令牟氏晉省調養，面加勸慰，牟意始稍轉。旋因甯朔紳民，紛紛來省，迎其回任，主席馬鴻逵以民意所歸，不便強留，乃囑其回甯朔安心服務。不料牟氏前念未泯，死心已決，歸後又於七月二日午刻潛赴縣南龍王廟前，脫去衣帽，縱身入河，及縣府人員發覺縣長失蹤，派人四出尋覓，果在龍王廟前發見牟氏遺物。旋於衣袋中檢得絕命書一紙，始知已投河；惟水流迅急，屍體已漂沒無蹤，迄未撈獲。牟氏爲官清廉，身後蕭條，其夫人現在任中，公子及姪，尙留省垣。聞省府當局及牟氏生前友好，以其志可壯，而其情可憫，擬代據情呈請中央，優予撫恤，並將於日內舉行追悼大會。茲將牟氏所遺絕命辭，節錄於下：「亡國之禍，迫在眉睫，嗚不忍視，吾黃帝子孫淪爲他人之奴隸，牛馬，甘願投河殉國，喚醒國人，甯爲刀頭鬼，不作亡國奴。庶有力圖挽救，收復山河之一日，

牟鳳鳴遺筆。(二二日)

先生！我想這位牟鳳鳴的壯烈是值得標揚的。他的生活的偉大處，就在他無我，忘我，只有民族國家，這一點，不是我們這些怯懦的小百姓所正需要的麼？

也許有人要把自殺看做是消極。我完全不承認牟鳳鳴的自殺是消極的；在「喚醒國人」的意義上，我只看見充分的積極的意義。

不知指導生活的讀書生活亦肯花點篇幅來介紹這一位有骨有血，為民族爭取人格的典型生活否？」

——江敬棠

我們是在一種驚懼的情緒下讀畢了江君以上的通信。我們顫慄了。我們感覺非常慚愧，像江君這樣有熱情的青年，腦中充滿的竟是這樣樸素過時的思想，這不能說，凡負有社會教育職責的人，不該負責任的。我們是一向把青年界看得太理想了，所以對於凡是認為太過時的東西，不想掣來再談，誰知我們自己反犯了把眼睛長在頭頂上的錯誤

，看不見當面的現實，這是不能否認的。因此，我們以後到要注意更平凡的謬誤的糾正的這一方面了。同時我要順便告訴一切進步的青年，也請你們了解這一點，如果你們也碰巧讀到這封復信，因此引起你們想到自己也常常遇到這樣的遭遇，就請你們更平心靜氣一點，不要厭棄那些認識不如你的人，苦口婆心的與他們細談罷！你要做到說服他們爲止，這是不白花費時光的。

江君，請你千萬不要見怪我們說話的爽直，不要以我們這裏所進的忠言爲逆耳罷！江君，你來信中全篇的話幾乎句句都犯有嚴重的錯誤，我們對於你的意見是完全反對的。但是，我們知道你的真誠，你是一個東北的有爲的青年，不過因爲你的生活的環境，你所接觸的那一些人物實在太落後了，所以給與你的影響，也不能不同的落後，這樣純樸的青年，在你們東北，我看得特別多。不錯，這不能專責你們不上進，恰恰相反，這是目前你們那裏，可悲的實踐所賜的結果。你們那裏對國內的實踐實在太隔膜，你們看不見國內的新聞，雜誌，新出的科學和文學的著作。你們完全與世界隔絕了。自然，

你們不滿意你們的生活的實踐，有時甚過我們，但是對於實踐是如何看法呢？如何去打破你們當前的困難呢？你們的社會階層的生活限制了你們，你不能看見反抗的力量所在，你們與真正的戰士隔絕了，你們自己只有熱情，孤憤，牢騷，眼淚。進得關來，你能看見的也只能是外表，你只看見國內昇平氣象，洋場上的高歌甜舞，「高等華人」的醉心富貴，老百姓受罪受苦，不高談國事，於是就斷定人心全死，「全國人民均沉於醉生夢死。」所以你看了一個知事老爺說了兩句大話去自殺，就這般同情起來，認為是什麼了不得的「忠義之氣」，足為世人效法的一種生活典型了。

江君！在我們批評自殺殉國這一問題以前，我們不得不先指出你的眼睛上是遮蓋了一層如何可怕的眼障。如果不先將它除去，我們是不會能說服你的。

外界的現象完全與你看的不同。中國全國人民除極少數外，並沒有醉生夢死，他們恰恰是相反的在艱苦中掙扎，在為自己為民族爭生存。他們更沒有忘記國家，更不是不敢談，不願談國事，他們留心每一件國事的發展，比任何高等人更仔細，他們真的是

「無我」「忘我」；因為他們都是一無所有，不會把自己個人利益看得比國家還重要，他們在萬死一生中求生存，在死亡綫上作困鬥，所以也不會怯懦，退縮，灰心，絕望。他們因為人衆，所以也不會感到孤獨，悲哀；他們有的是公憤與公鬥。自然，這一切是不能從外表看見的。這要有相當的認識工具，突過了個人利害的圈子，站在民族全體的利益的立場，混進大衆羣中去，你才能看得清楚。江君，可惜你與大衆離開遠了，你不知不覺的，受了那些僅知個人利益的人口頭上常說的那幾句謊話，反把它當作真實。

謬誤障了你的眼睛，使你看不清一切，這才是你犯着謬誤的根源，對於牟鳳鳴的曷采這種樸素的誤錯，我以為這不過是病眼中一個例子罷了。

江君，我希望你過細體會我以上的妄言吧！

現在要進一步來批評這位甯朔縣長牟鳳鳴的投河殉國了。

我們以萬分的善意來分析這件事。細讀這一則新聞，我們就不難看出這位牟君的思想是一種什麼思想：「比年以來，痛心國難，深受刺激」。我們知道他並不是一個醉生夢

死者，但他對國難及民族解放的認識，我們可以說他是摸不着頭序的。我們看他「時與人慨談國事，輒高歌岳武穆滿江紅詞，聲淚俱下。」就可知他滿腔裏裝着的不過是一位亡國大夫的悲憤，這一般怒氣是不能發揮力量的。

再看所遺的絕命辭罷。我們實在感覺得這種老調子唱得太多了：在滿清末年，它却是最時髦的東西。因為自殺殉國比較專制時代自殺殉君，自殺諫君是一種新鮮的玩意兒，雖然它確是這種封建的死節的遺物，不免帶着一點封建的氣氛。到民國以來，因為國難的層出不窮，青年們也常玩這一套，我記得我們湖南曾經特別愛出這類人物，一經自殺，萬人歡呼欽佩，稱為烈士，英雄，當時湖南人甚至自傲的說出「別無出產，唯有英雄」的妄語，絕命辭也就成爲一種文體了。

時代的進步，這一現象在我們湖南早看不見了。這是因爲青年們已認識自殺是一種愚行，自殺徒損耗了自己的力量，並不能給與什麼像江君說的積極意義。專制時代一個忠臣死諫，有時確能感動一個賢君，可是，在帝國主義時代，要想用自殺自己「喚醒國

人」，這明明是把個人的死誇大得太大，同時也是把熱情誇張得太大。「亡國之禍，迫在眉睫」，「不願淪爲奴隸牛馬」，是大家起來抵抗。有人不清醒，你要去喚醒他，說服他。自己清白了，就應該用英勇的抗戰的行爲去喚醒廣大的國人。「甯爲刀頭鬼，不作亡國奴」是對的，但刀頭鬼應該是指死在同敵人作戰被殺的意思，不是國未亡先把腦袋取下。我們要知道，喚醒國人，不是死一兩個人這樣就被喚醒了，它的本身是一種很難的意識的鬥爭過程，這裏包括兩方面，一爲肅清帝國主義意識，封建和資本主義的意識；一爲形成新的民族解放的意識。而這過程的形成，雖然一方面是教育與宣傳，但最有力的還是實踐的戰爭，真的同民族敵人開火了，就是酣睡的人也要被大炮轟醒啊！

牟君是士大夫的階層的人，他看不見這一些，不能了解這樣深刻，他是一個孤獨者，他看見國要亡了，他也像江君一樣只望到表面上的現象，「人心全死」了，自己又無力出去抵抗，又不願爲奴爲僕，三十六計，只有逃脫人間的一法，這樣到落得保一個抽象的清潔的美名。不問牟君在自殺前意識到不意識到，這個，那都不打緊，其自殺過

程確是如此。

這種行爲，因爲與漢奸比較起來確是高尙萬倍，就是比起醉生夢死的人，也要高過百倍罷！於是與牟君同一社會層的人，就像江君一樣，好像煞有介事的給人以過度的同情與誇大，輿論亦只評其「其志可壯」，不欲嚴責死者的自殺的錯誤，所以對這類批評，一般人是輕易不肯下的，這種錯誤也一向在同情下隱藏，很少嚴肅的將它清算。

江君！現在中國民族危機嚴肅到了什麼程度，你是親身嘗受着的，我不想再在這裏來說廢話，但是知道了危機又怎樣呢？我希望你從正確的去認識現實中求解答。在使你走到正確認識以先，我對於你腦中那些有害於你的觀念，不能不作這樣不客氣的批評，對於牟君個人，雖然也覺得清潔可敬，但在真理方面說，實在難於同情他的行爲，所以也深刻地指責他了。

是的，我們對於江君的忠告，不僅把江君當作個人，我們是在勸告和說服與江君同一觀念的人，對牟君的死的批評，自然不是着重牟君其人，而是着重於這種錯誤的行

爲，在今日，投河殉國的時代是已經過去了。

河殉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

——答高情君並批判衡哲先生——

「一個人到了生死的關頭，只要他尚有生存的意志，他總要張着眼睛更認真的去找他的生路的。這大概就是所謂死中求活罷！我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遇到存亡危岌，凡不願爲奴爲僕的國民，總不能不有所計議，在萬分艱險中，去求民族的生路，去爭得民族最後的勝利的。」

這裏最關重要的是我們認取的路是一條什麼路。如果我們把死巷認作生路，我們個人或民族社會因而死亡，如果我們認取的果是一條康莊大道，則「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轉瞬間轉危爲安化弱爲強，在歷史上是常見的，並不是一種幻想。

現在我們個人和民族也都走到最嚴重的關頭來了。我們都張着眼睛在望，我們要找

一條路走，到底何處是我們的生路呢？

獨立評論第一五七號衡哲先生，替我們開出一張路單來了。她問我們：「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最後她也暗示了她看出的是一條什麼路。但是她所指出的是死巷，還是康莊，我們不能盲目的依從啊！

據她說：「依我看來，橫在我們眼前的道路，有四條。第一，是那渾渾噩噩的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是那在「刀頭上舐血吃」的廉恥掃地的路。這兩條是辱身亡國的死路。第三，是那「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拚命的路；第四，是那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這兩條是自救的活路」。

自然，她之認爲生路的，是從這四條路中選擇出來的。我非常懷疑，展在我們民族當前的果真就是這四條路麼？

我極希望你們對這樣當前嚴肅的問題有無顧忌的批判。先生！「獨立」在華北是有相當的讀者的，在大家都在死的沉默中，雖然是一種微弱的蚊聲，也許要被人認作是洪鐘

啊！」

「展在我們民族當前的果真就是這四條路麼？」高君這種懷疑令我吃了一驚，因為我手頭也正握着一份「獨立」在看，也正讀着衡哲先生那篇大文，我所感覺的也竟與高君一樣，覺得我們當前的路不見得就止這四條了。

是的，我們在這嚴肅的沉默的時候，固然我們希望有人肯出來說話，替中華民族開出一張生路的路單來，但同時也完全同意高君的意見，覺得要有人「無顧忌的批判」才好，不然隨便開口亂道，等於庸醫誤投藥劑，他是可以斷送民族的生命的，或者他的原意是在救國，而事實上反在替喪心病狂者在辯護也未可知。所以凡自己有不同的意見，也應「不顧忌」的寫出，至於自己的意見是否正確那也仍望有人出來指正。

現在就老實的接受高君的建議來進行衡哲先生的「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的考察罷！
首先來看衡哲先生的路單罷。

到亡國辱身方面去的有兩條。第一條「是那渾渾噩噩的行尸走肉的路，」這一條路

走的人是誰呢？衡哲先生的意見是：「向來缺乏國家觀念的中國人，」是：「沒有受過高度訓練的人」。「一是愚，愚則不能分別友與仇；二是窮，窮則管不到口腹以外的事」。所以「大多數人民缺乏敵愾。」照這樣的說法，中華民族是無望了，因為窮與受不到高度訓練的既然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眾」，而這些「大眾」都走上「行尸走肉」的路了，那還有什麼「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要問呢？

這無疑的是在說謊，中國人沒有國家觀念的並不是沒有受過高度訓練的人，而恰恰相反，正是身受過高等教育者。沒有教養的人，雖然比起吃過海水的博士學士來，要「愚」罷？可是他們却反易於認識「友與敵」，現在一切充當漢奸的，不有是留學生大學士，至少也是認識幾個字的麼？中國工人農民充當漢奸的就沒有過。再說窮罷，「窮則管不到口腹以外的事」也是假的。窮了，更要求生存，這才是事實。只有有了百萬資財才會想到「把那已經枯竭的中國銀錢，匯兌到某一個強國去，存在那裏，等着，等到這裏不爭氣的社稷發生了根本上的搖動時，他們便攜了妻兒，帶上細軟避難去。」我們祇

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

看見窮得精光的人，也是最勇敢管「口腹以外的事的人」，是的，他們也不能不管口腹，可是他們知道先要求得大我的生存，個人的口腹才能得救，不是像富家兒只看見自己的家和細軟的。

總之「行尸走肉」的路確實是有的，不過走這一條路的人却不是中國多數的人民。走這一條路的人是誰呢？是走第二條路人的阿哥阿妹，以及他們的親屬。這一種人比起在「刀頭上舐血吃」的人來，膽子要小點，臉皮要薄些，心中也還有些溫熱。可是他們不敢看現實，又無膽子吃人血。他們怎麼辦呢？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在極端矛盾中，不生不死的生活，「行尸走肉」就恰好說明了它。因為她們看不起奴隸，却又不想打斷頸上的鎖鍊，於是生出「得過且過」「媽媽虎虎」「裝死」，等思想，自己雖然是實實在在的奴隸，自己雖然也在和他的阿弟表兄分吃刀頭上的血，却故意裝做不知不覺，這種人才可以算是行尸走肉。他們在外表上雖然帶點渾渾噩噩，却是裝的。真正「渾渾噩噩」的窮小子，雖然也有少數在以上的主人充當奴僕時，一時也染有主人的氣習，可是那是不足數的

幾個，真正「渾渾噩噩」深山窮谷中的人民，並不會走「行尸走肉」的路，他們雖然不認識今日的世界，但一旦有人侵到他們的村莊，奪取他們的田舍時，他們是會以血還血的。東北不是有無數渾渾噩噩的人民，到死方止的在與他們的敵人抗戰麼？

這一點，不能不首先辯正，不然，我們會看不到我們真正的出路。

第二條路，衡哲先生已說得盡夠了，我不想再去說它。走這一條路的人正是衡哲先生說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不是窮人，」是「擁有財產，」把「家私細軟」搬到外國作富翁的人，「種種式式的道地漢好，」這類模特兒現在很多，真用不着細表，這條路現在確是有的，是一條通達到亡國的路。但它與中國大多數的人民無關，因為這條路是向來不被大多數的人注視的。

亡國辱身的路我們自然不能走，並且在事實上大家也不會走，因為我們沒有具備往那方去的條件；但是，求生的路呢？

第三條，衡哲先生說，是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拚命的路。據說：「走第三條路

的，有時是用抵抗的方式，有時也用自毀的方式，有時兩式並用。」這就是，「甯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意思。並且衡哲先生還用了一六七二年荷蘭人民決堤灌城以杜法王的進佔，一八一二年俄國人民焚毀莫斯科以延拿破崙的侵寇」做例子，表明有書爲證。這條路是否是生路呢？據說「有時抗拒的結果仍挽回一個國家的危運，但它的榮譽與人格却至少是保全了。」這種說法，在當今的中國頗時髦，動聽，其實這是似是而非的。

確定民族的出路不能是孤注一擲的。「知其不可爲而爲」的精神，在鼓勵個人奮鬥，雖然可以加強一個人的進取力，但對於民族那就變爲冒險了。何以故？因爲個人到了沒有辦法時，逼得你孤注一擲，失敗也不過一身的問題，不會影響再遠些；民族國家就非如此，我們不能把全國民力在力的對比絕對懸殊中，來自毀自己。荷俄的例子，只能看作是戰術，方是正確的，不能認爲是最後對付敵人的善策。

但是，難道我們主張不可爲就不爲麼？不是的。我不過指出這不是引導我們往活處走，這只不過是痛快一時的投機冒險的行徑，不能認爲就是生路。中國今日的出路並不

能往這方走，雖然這條路是比以前兩條是光榮的。但我們要求的是生存抗爭勝利的光榮，不是民族死節的光榮呀！至於我們求生的出路是什麼呢，我想，檢討了衡哲先生指出的第四條路以後，再作肯定的指示。

第四條路「是那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這乍看起來也是對的。這就是「充實國力，長期抵抗」「五十年後再談恢復失地」等等的理論的基礎。這在今日已一天天被人懷疑了。這問題簡單得很，就是在今日的亡國之下是否允許你作「三年之艾」的準備呢？這完全是幻想；因為今日亡人國者的殘酷的壓迫是超過任何時代的，我們絕不能在未亡國前作此打算。這是一。

其次，所謂「在這大難當前的時期中，每一個人都應該咬着牙齒，先把自己的身體培植到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後再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專門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內，把能力與智識弄得充充實實，聽候國家的徵求與使用。」這是否就是準備「三年之艾」呢？中國現在受人侮辱是否是國家沒有專門人才徵用呢？這完全是自欺欺人，替無

恥的忍辱偷生的人辯護的話。須知要磨練個人成爲民族鬥士，只有在民族戰鬥中，不是個別的在書齋，實驗室受訓的。至於「組織力」，「合作精神」，「忘私仇」犧牲小我」等等，都祇有在共同統一的一個陣綫上，在堅苦的抗爭中才會產生，不然，「盡是癡人說夢」。這樣空洞不着邊際的「有計劃的忍受」，我不知道「計劃什麼」，一九三二年以後時談它，現在的「艾」呢，在那裏？這與無恥的偷生，有什麼分別呢？

是的，這四條路都是不明不白的，我們只看見死路；痛快一時的路，「漫漫就沒」路，中華民族的生路在他的文章中是看不見的。

「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還要我們自己去找。

我們還有什麼路走呢？往那裏走才是生路呢？

我以爲我們走的那一條路，是在下面正確的認識與估量下而被確定的。

第一，我們應該認識自己的力量所在，是在大多數國民身上，只有他們才是民族的主力。不是在少數智識者，及其一部份軍事力量。

第二，在以上的力量集中下，組織下，中國物質力量足夠打擊任何野心者的侵略，保持領土完整，主權獨立。連軍用的東西都在內，我們敢說如果全國的槍尖都能一致對外，雖然是落後的武器，在作戰上仍可以發揮驚人的自衛的作用。

第三，我們應充分認識國際的變化，從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中，他們國內社會的分化中去估計侵略者的力量，不要過於誇大敵人的勢力，精密的去計算敵人作戰的能力，和支持力。不要盲目的拜倒在一個坦克車下。

第四，我們的民族抗爭同時要顧到一切弱小民族解放運動，去看自己的力量。

第五，要明了準備是在抗爭中，力量的正確的認識亦是在行動中，要動員了，「組織力」「團結力」，「犧牲精神」「私仇攜手」才有可能，不是等「三年之艾」從天上掉下的。

第六，要先有以上的認識，由這認識造成我們的信念，我們才能支持長久的戰爭，不能在鋒烟中看出最後的勝利，以及將來堂皇的輪廓的，就不能勝任帝國主義新的侵略下偉大的解放抗爭的職責。所以我們的前路，不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而要是「知其

「可爲」，「必然取得最後的勝利的爲」，才是我們走的道路。

難道「我們走的是那一條道」還不清白嗎？

我們並不忘記在校學生的讀書與生活

——答胡辰君暨全國在校愛讀本刊的諸君——

編者先生：

許多朋友都覺得讀書生活一期期在進步，在發展，大家很歡喜。回想自己在求基本知識時，完全瞎摸瞎撞，那時那兒有讀書生活這樣的刊物呢？讀書生活的對象自然全是「生活」，一面讀書的青年人，然對於和「生活」脫離了，被關在學校大門裏的中學生們，貴刊也還是有很大的意義的——即使有許多大學生，恐怕也還該向貴刊來學習一點基本的知識呢！

因此，我在一有機會時，就把貴刊儘力介紹到學生羣衆中去，所得效果是非常好的。然而，問題也同時來了。有些初中二三年級的小孩子，他們受了讀書生活的影響，

再加上教師的昏庸，學校當局的糊塗，於是對學校教育整個懷疑了。懷疑是好事，在懷疑之後自然要知道怎樣辦，於是來問我。我呢，自己也是在這種關起大門來的學校中打過滾的，當時也就得過且過的過去了。現在我們是不是還可以把這種得過且過的態度教給比我們更年輕的孩子們呢？是否就教這樣的小孩子離開學校去「生活」呢？於是我的結論也還只得是：「教員的話少相信點，自己要多定些有益的書報看」——然而其實我又知道，你是在學校裏，教員的話即使不相信，也還是要聽，聽，聽！學校裏要讀的書還是要讀，讀，讀！這樣我實在覺得很困難了。

貴刊的對象雖不是學生，而學生的讀者大概是很不少的。即使不能常給他們專門寫許多文章，完全忘記他們也是不大好的。希望你們能夠或者就在讀書問答裏，對於已經關在學校而不滿學校教育的人，做一個明確的實在的指示。

胡辰

x

x

x

讀完胡君這通來信後，頗引起了我們許多感想。本刊到本期止，一共還僅出到九

期，打開創刊時所擬定的那一點不全不備的計劃來看，現在已經實現的，誠不免還是其中的一部份，許多要做的事，要說的話，都沒來得及做，來得及說。我們自己早已感覺有幾分不安了。近一月來，因為這小小刊物已走遍全國，遠及南洋各地以後，我們接到各地各社會羣團的來信也更多，對於我們提出的意見和要求也越具體，越繁雜。我們今後的工作，在當前的進程中，也自信是更走到與實踐更相結合的階段了。

在許多的忽視中，對於「已經關在學校裏而不滿意學校教育的人」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但這不是「完全忘記」，是這方的比重在本刊的對象中要來得較輕的緣故。本刊的對象已在創刊號里說得明明白白了，我們雖然不拒絕有機會受學校教育的人來讀，但我們的基本讀者，不希望是在校學生，而希望是更廣大的不能走進這鐵門的生產大眾。過去是如此，今後尤當往這一方向努力，使本刊變成更適合于廣大的人們自學的東西。雖然如此，我們却從來未把「在校學生」放在「生活」圈子以外「完全忘記」了這一生活圈內有廣大的讀者，這一生活圈內有許多不滿人意的問題，一定也有人

要提出來討論的。自然，讀書生活是不拒絕討論到這一方面來，也決不會忽視這一圈子內提出的問題的；只是，在本刊討論的範圍內，其比重要佔得小一點吧了。

這是我們首先要答覆胡君及全國本刊的「學生讀者」的第一點。第二呢？我們覺得死板板的把「學生」作為一種特殊的人，把他們圈在一種特殊的生活圈子內，認為與社會無關，是很不合理的。學生雖然在學校，但學校仍是在社會中，並且是在實踐的中國目前這百孔千瘡的社會中，他們雖然一面過着學生生活，一面却仍是營着社會生活，並且這學生生活的本身就是要通過這社會生活的。學校不過是在同一社會實踐中，一種特別注重教育的機關。它並不能離開這實踐，學生生活並沒有離開社會。這樣說來，以作爲了解生活而倡導的讀書生活自然同時應該是學生的好朋友，讀書生活也無疑的要替「學生讀者」代爲解答各種生活上的問題了。

可惜的是，今日的學校教育，把這種同一的生活不合理的將它分開了。學校那張鐵門，不獨掛上「你無錢，不要進來」的牌子，同時還不許進來了的人，再把眼睛注視下

面。教育者們只知閉戶造車，把許多天真活潑的青年，一天天拉開現實。它教你「爲學問而學問」，它教你離開「凡俗」，它成爲一種特殊羣團子弟的修道院，消閑所，它與中國社會實踐確實離得遠遠的了。

在這種範圍下，我們自然看不見實踐的知識，只是一些煩瑣的說教，抽象而又形式的知識，應試的教科書。教育者特別注意的是：死板的背誦一些不知從何而來，有何用的公式公理，原則等。他們就以這些死知識作爲學生的糧食。

在這種範圍下，我們看見的是許多活潑的青年，一天天少年老成起來，同時有許多活潑的青年對這種教育生出根本反感了，這裏，「再加上教師的昏庸」，學校這園地，一向不是陰沉沉的無朝氣，就是接二連三的鬧着無休止的風潮了。這用不着我舉出實例來，二十年來中國學校的風潮，雖然原因非常複雜，根本原因無非是從這裏長出來的。

現在學校教育，一般說來，雖然比我們以前「打過滾來的」要來得進步，但據我們最近所收到的來信說，對於讀書生活發生好感，對學校教育的懷疑的學生，並不只是你告

訴我們的事，這確是當前教育一種最嚴重的現象。這現象的出現是不足怪的；我們決不以爲這是自己的刊物辦得好，它勝過學校教育；而恰恰相反，我們只覺得我們的能力太有限，太不夠，這一領域的教育問題，不是我們可能解決得了的，我們也不會不自量的把這份担子輕輕的放在自己身上。我們希望的却是請主持學校教育的人自己有新的反省，我們的刊物所能盡的任務，只能在某一些問題上說幾句我們可能說的話，或提出某一問題來同大家討論，以及提供一些學校教育不及的知識。所以，主持學校教育的人，對於讀書生活雖然惹起了學生對於你們的不滿意，却不應反來怪讀書生活，應如何去研究學生爲什麼不滿意學校教育，而謀學校教育的改革呢！

胡君提出的問題，最根本解決的方法自然這裏談不到。這要涉到整個學校教育改革大問題，那裏是幾句話就解決得了的呢！在目前狀況下，對於這些不滿學校教育的青年，確不能不有一個「明確的實在的指示」，我們姑且接受胡君這一建議就對於這一方面來說幾句話罷！

一切有機會住學校的朋友！你們在求知的機會方面說，是很幸運的。現在的學校教育的不能盡滿人意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這不必即抱悲觀。不應「得過且過」，也不必因一些不滿就「離開學校」去另找「生活」。你們應該把我上面說的學校教育離開社會實踐那一段話多看兩遍。首先改變專有不平，忿怒，灰心等觀念，趕快自己起來謀補救。

對於一切補救的方法，都不應專從個人着想，由個人孤零零的去謀個人的解決，那是會走不通的。一個覺悟的學生，應該同時注意到你的同班同校的朋友大家的生活。你應把大家的不滿，在級會，學生會，自治會等裏面去公開的討論，並誠摯的請學校當局參加，使他們明白你們的意見。你們一點不必存着客氣，不敢對於學校說話，同時，不能帶一點意氣走入無謂的胡鬧。這是對一般問題提出應走的途徑。

關於課程方面，學校教育有它的特點。它注意的是基本的知識。今日學校課程最能滿人意的是完全忽視了社會當前發生的一切事件，使基本上所學的不如同當前活鮮鮮的一切事件相聯繫。這一方面是教科書的編製不善，一方面是教員的機械的教法，留聲

機似的敷衍。所以，學生常覺得讀一種刊物比較有用處，有趣味，拿了一本化學就感覺頭痛，覺得無實用。這是因為前者是與生活接近的，後者與生活隔得遠遠的緣故。但是化學的知識的重要，任何人不能否認，這門知識不能離開實驗，在學校中是比個人自修方便的，但是沒有興趣應如何解決呢？一句話說完，就是與「實用」和「現實」聯繫起來，你們可以要求教員，或具有科學興趣的人，把這些書上說的東西應用到一些日常的或現實的問題上去。同時多找關於同性質的科學雜誌做參攷。你們可以研究目前化學戰爭中各種有趣的發明，自己製造避毒面具等。這不僅與實用聯繫了，同時與國防，民族反帝各方面都聯起來了。化學這東西難道僅僅是記一些與生活無關的公式，若干化學品名而已嗎？

再拿邏輯說罷，這是一門最抽象的科學。你如果專聽一種講義，專讀一本教本，那真的夠你受了。我記得，我在中學時代，最不高興聽這一堂課，我們稱它為催眠術，照例，是不大聽入耳的，每一堂課，總有好多同學酣然入夢，大家的成績，自然特別壞。

現在我也聽得許多學生告訴我：邏輯是最難懂的科學。其實不然，我以為現在做學生的除聽了講堂上的課本外，正不妨同時找幾本新的邏輯來對讀，把形式邏輯與動的邏輯比較來研究。把這兩種邏輯一齊應用到分析歷史上的事件，當前國際情況，或日常生活問題，個人思想各方面去，看那一種是正確的。我曾經指示過幾個朋友這樣的做過，他們在半年中對邏輯的觀念不再是神祕的疎遠的了，覺得平凡已極，趣味無窮，真是從「宇宙之大到蒼蠅之微」無不是邏輯的具體的實例。我親自聽見一個學生說：「我自從把形式邏輯同動的邏輯對讀後，我才真的了解了邏輯。同時對於課堂上的形式邏輯課也生出興味來了。我並不覺得聽了「白馬非馬」會完全無益處」。這話挺對！這是把學校功課的無味，不夠，變成「趣味無窮」，豐富無比的一個實例子。

再來舉一個例子吧！譬如初中的國文，現在一般學校大概不大用一種固定的教本，喜歡用開明，北新等活葉文選了。這些書店裏印出的文選是否精當，自然還有問題，再加上你那位國文老師是一位怎樣的人物，如何來選擇這些材料呢？那又是一個問題了。

無論怎樣，每一個學期選讀幾十篇選文，即是精選也不見得就能滿人意。這樣應如何補救呢？就是多讀各種新出的文學作品，無論翻譯的世界名著，或國內名家著作及期刊上發表的文字，都無不可。這一來，你對於講堂上的東西，不會存着過大的希望，同時也不會感覺過于失望，興趣也就自然生出了。

我還有一位朋友，他對於自己的兒子對於學校的英文課沒有興趣是這樣矯正的。因為初學外國語，死記生字，缺乏機會去練習「聽」「說」是會感覺萬分乏味的。他就鼓勵他聽無線電，常帶他去看有聲電影，開「話匣子」等，以補學校功課之不及，以後得着很好的效果。自然，這不是人人能辦得到的，尤其內地不容易辦到。不過，就學校課程上的缺陷說，雖然我僅指出以上這幾個例子，也就可以以一概十，就是說，這一切功課上的缺陷，學生如果能採集團的讀書會，研究班等方式去求解決，學校當局沒有反對的理由，大概都是可以設法謀着補救的。何況每一個學校中，總還有一兩個高明一點的教師可以負起指導的責任來呢？

這是就學校已有的功課方面說。至於講到生活呢，這一方面問題就更嚴重了。我們以爲，現在在校的學生，最大的錯誤，就在不問世事，只讀死書。好的學校勉強可說能給學生一點書本知識，却不知道如何教學生做人，做現代中國的人。我們希望在校的學生現在要趕快醒悟，打開眼睛來看社會。你們要多多接受課本以外的知識。

一個好的大，中，小學學生，不應該專讀課本，要多多接近課本以外的讀物，要天天看報，看雜誌。

要注意世界，中國，本埠，學校，發生的不論大小的每一事件，自己要提出對於這一事件的自己的意見，組織各種討論會去研究它。

如果社會上發生一件什麼重大事件，已形成一種大衆運動了，你們不僅應該站在旁觀地位去觀察它，還應作爲這運動的一員參加進去。

要注意學生生活以外各社會層的生活，這裏你應勤於檢讀報紙上的社會新聞，工廠，農村的通訊，以及讀書生活上的「生活記錄」等，同時多多參觀工廠，農村，以廣大

自己的生活的眼界，豐富自己的生活。

以上不過信手舉出幾件來做例子罷了。如何使你們在校當學生的人的生活豐富呢？我們敢於堅決的說，課本上的用功至多只應佔百分之五十，其他百分之五十應該放在閱讀課外刊物，參加討論會，研究會，參觀，聽演講，和有生活經驗的人的談話上，及什麼活動上去。讀書的目的要放在學習生活上，要明白學習生活不一定是在書本。

現在應該明瞭學生要自己起來自救，不要對於「教師的昏庸，學校當局糊塗」專門來「懷疑」，或想逃出這「鐵門」。自救之道，就是照我們以上提出的話，舉一反三，用集體的力量去謀實現。

最後，我們還要對在校的朋友們說幾句，就是你們今日所處的環境確實比我們的時代是好多了。今日的中國出版界雖然仍甚貧弱，但也還有相當的社會科學文學等類的書，十數種以上可讀的雜誌供你們的瀏覽。你們倘若真的肯努力的話，就是由於自學，也不怕自己知識不長進，何況你們還有機會去接受一些學校內特具的基本知識呢？

努力罷！不必離開學校！不要煩愁！請「面向現實」充實你們的生活！

我們並不忘記在校學生的讀書與生活

中學生對於過重的功課應取什麼態度？

——答劉大超君——

「自從貴刊第一卷第九期『讀書問答』內登出了那篇「我們並不忘記在校學生的讀書與生活」的文章後，讀書生活就在我們之間建立了很好的友誼關係了。那篇文章，真是傳讀一時，不知打開了多少青年的眼睛。可惜的是，我們的功課太忙，以後也沒有時間細細的去讀每一期的文字，就我個人說，大概每一期的讀書生活的目錄是看的，但注意的只在找「替學生讀者代為解答各種生活上的問題」的文章，一看沒有，也就不再看其餘的了。

貴刊對於學生，實在注意得太少。事實上在快到兩卷的讀書生活，只載過上面指出的那一篇文字。先生們對於學校生活，尤其是中學生的生活似乎還隔膜得很，這不能不

說是讀書生活一個小小的缺項。

在暑期中，我同幾個朋友都把讀書生活補讀了一遍。我們吃了一驚，我們在這百多萬字的文字中，獲得的知識真是不知比學校數年來從講義中得到的多過好多倍，並且，也是平日一般刊物上看不到的。因此，我們更爲愛它，更想它對於「已經關在學校而不滿學校教育的人」多多給些指示，同時也希望主持貴刊的人，多知道一點中學生的生活。

是的，今日中等教育一般的缺點，似乎在前面那篇文章中已指出過了。不過，那總是太一般，太偏於原則的方面。所以你們的指示，雖然百分之百的正確，但因不很合於實際，也就無法使我們都去照做。

現在且入本題吧！我是一個高中在下一學期就要畢業的學生，同時也自信是一概比較進步的青年。我在寫這封通信中，我不知怎的覺得有些傷心，好像孩子們受了委屈，要在大人面前來訴苦似的，先生，我們是受學校的委屈太多了。

今日的中學，在課程方面，不獨是與實踐隔離，不使你去接近現實，並且有意的與現實遠離。每天平均我們要上堂七小時，甚至八小時也有的。早操軍操演習；強迫的聽德育的演講還不在內。我們一天被許多功課弄得頭昏眼花，精疲力竭，一切時間，精力都被課程表上規定得好好的了。連看報的時間都沒有，課外的書籍刊物，更不用說。學生中能看看雜誌的目錄，和書店的廣告的人，那就是格外現實的人。

中學生中天天閱報的人並不多，如果有的，也不過在午飯後那半個鐘頭內，彙忙的看一點。所以國際問題，甚至連發生了很早的事，在一般學生中也還是非常生疎的。他們的世界，是被用講義，課本築成的城牆包圍住了。自然，什麼國難，危機，在美國原本的課本中是看不到的。

但是學校當局還恐怕學生注意外務，更在功課繁重以外，東來一個會攷，西來一個獎學金，使全體學生的眼睛，都注射到看得見的銀杯銀盾，和雪花花的一百念幾塊大洋身上，或陶醉於千人拍掌虛假的榮譽當中。這樣一來，連學生寢食的時間，星期放假日

的休息都一概用到課本上去了。使你不能有一刻鐘接近外界。

還不僅如此，據今年暑假已畢業的同學說，今年幾個有名的大學考試就難得不講理由，許多平日成績十分好的人，都落伍了。這種難不是無緣故的，這是教育當局一貫的設計，在提高程度的名義下，達到學生只該埋頭書卷中這一個目的。

先生！單就這一方面說，這對於我們青年是何等嚴重的問題啊！這是我們不進步嗎？不想上進嗎？不注意實際問題嗎？這種用過度的功課來消磨青年的精力是合理的嗎？

至於所選的講義，課本的陳舊，教法死板的注入，對於學生生活方面只注意個人的活動，阻止團體的活動，甚至利用學生作少數人的吃飯活動等，在這裏都不說它了。

這還不夠說是今日中等學校的危機嗎？

是的，學生的不滿是一般的，普遍的。其中最最少數的學生，因為多接近了一點現實，他們看不起這樣的功課，教師，更對銀盾，獎金，文憑都發生非常的鄙視，憎恨，

他們甚至不上課，不打開講義，一心專讀自己愛讀的書，可是，這樣的行動是不能得學校許可的。即令不被學校開除，也自然會在學期攷試中被排出校門的。先生，在這樣的環境下，到底我們應該怎樣自處呢？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恐怕這是全中國中等學生當頭苦惱的問題罷？望貴刊給我一個公開答覆。」

——劉大超君來信

我們對於在校學生少說話的原因有三個：第一是，我們覺得這年頭被學校排出的人一天天加多，對於他們自學指導更來得迫切；第二是，在校學生的讀書問題似乎應該歸學校師長去負擔，我們用不着去多管這些的；第三是，現在似乎真有這種現象，即「大學生不要讀什麼，中學生沒有時間讀什麼」；因此本刊就變為專對一面為生活掙扎，一面要求認識一點的人們特為說話的刊物了。在內容方面所集中注意的不是在校學生；對於在校學生，尤其是中學生間發生的問題，就自然不能注意得周到。雖然我們非常慚愧

這「一個缺項」屢被多多朋友所指出，但總是一會兒顧及不來。不是說，我們看不見這方面的問題，否認這方面發生的問題，要迴避而不出來說話。

不錯，劉君上面這封通信，在一般說，我們在「我們並不忘記在校學生的讀書與生活」一文中也觸到了，也可說作原則的解答了一部分；不過，劉君這次來信比起胡辰君提出的更具體些，這是因為劉君是一個中學生而胡君是一個教員的緣故。我們自然更高興聽劉君的話，樂於來同劉君討論。然而，我首先要向劉君及中學生諸君聲明的是：劉君提出的問題，我們這裏仍然談不到最根本的解決的辦法，因為根本的解決是「要涉到整個學校教育改革」，對於今日學校教育的缺項，這是公開的事實，有眼的人都可看到，然而我們仍然把劉君來信在這裏公佈，除開要解答可以解決的部份外，就是想因此更引起主持學校教育的人及社會人士注意，造成推動學校教育改善的條件。所以，我們現在希望讀本文的讀者，去找出「我們並不忘記在校學生的讀書與生活」一篇文章來看一遍，因為我們在那裏說過的話就不再來重複了。

是的，現在中等學校功課太多，這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現在每一個中學生如果要顧到讀課本以外，還有青年本應享受的生活與教育，那幾乎是不可能了。我們常聽得學生的叫苦，甚或因做功課不來，攷試不及格，因此厭世自殺的事，這是表示何等嚴重的現象。學校當局這樣不顧青年身體的發育，這樣過於重視書本子，無疑的是不合理的。爲什麼學校要如此加重功課的訓練呢？劉君已認識的很清楚。第一要表示學校成績好，尤其是在會攷制度成立後，生怕自己學校的學生落第，面子上不好看，或教育當局要取締或減少津貼；第二無疑的也是怕學生管「閑事」，用書本子去消磨學生的精力，使他們再無心力去注意學校或社會的現實了。

當然，這也不是某一兩個學校特殊的現象，這是整個教育體系的弊病。我們極端歡迎對於青年關心的教育家們，多多對這些現象加以批評，這裏我們可以指出應該討論的地方有下面幾點。

一．課程上量的規定的嚴格限度——自然同時應該注意質的方面，不要與實踐隔

離。

二·會攷制度，虛偽的獎學金制度的弊害。

三·教育在書本上與生活上所佔的比重。

四·大學入學攷試的標準問題。

五·課外學生的自學與生活活動。

我們希望有人站在科學的教育者的態度，從以上各方面去批判今日中等學校的教育的弊害，造成中學改造的條件。

至於對於學生方面我們應該說什麼話呢？除開我們在上面那封信中指示的那些話以外，具體的說，你們對於這種不合理的功課壓迫可以取以下的態度。

第一，不要把分數看得太重，不必去希望那獎學金，銀杯銀盾不必去羨慕與你有損無益的虛假的「取第一」的榮譽。

第二，儘可能的把主要的學科做到及格爲止。

第三，儘可忽視一點無關重要的功課。

但是，你不能不注意到你的健康，青年應享有的身體運動，休息和鍛鍊。

你不能不把二分之一的時間用到注意你的現實生活，你的周圍發生的事件上去。

第一，自然是你的小圈子內的學校生活，你不應抱「一切不睬主義」，也不必只發牢騷和流入意氣的胡鬧，每一個好學生都應參與學校生活中每一種活動中去。在集體形式下，冷靜的去討論學校生活的各方面，要求生活的合理化，知識的實踐化。自然，在這種活動中，總難免不碰釘子。但不必灰心，不要以為替大家做事，就是白花了時間，須知做事中就可獲得許多知識，並且是在書本中找不到的。

第二，就是多接近課本以外的讀物，讀報要列為每日的必修的一課。這本來是有教育常識的人都不會反對的，不是什麼新道理。尤其在學校教育質的方面不良的今日，學生更應向課外讀物方面去謀補救。我敢說一句激烈話，如果想做一個時代的中學生，應該把讀課外讀物放到第一位，課本講義只能暫居第二位。

這是什麼道理呢？

這是因為今日中等學校的課程，在質的方面不能按照中國當前的社會的實踐，而是架空的在那里作鸚鵡式的教育。

中國當前是進入民族危機最高度的階段，又適當帝國主義第二次大戰的前夜。我們民族的存亡，就要決定在這一時機中。我們的教育自然應該配合這一實踐去訓練國民，成爲這一生死交關的戰鬥中的戰士才是道理。那末，一切課程在質的方面，就不能專門抄美國或日本的就算盡其能事了。

但是，據目下的事實，那是完全相反的。

做一個中國青年真不容易，在別的國家，也許青年只管讀書，不會越讀越糊塗的。但在中國讀書，要讀得不糊塗，也是應該自己去爭取。

如何去爭取呢？我們自然要到課本以外去找。美國的原本物理學，化學，甚至社會學，經濟學中，那真是找不出什麼「國難」「危機」等影子的。

自然，這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但「不容易」不是不可能，雖然艱辛一點，但到底你會有所獲得。在今日中國出版界，雖然貧弱可憐，却也不是完全的沙漠。要打開眼睛，仍然有賴它的啓示你。

更具體的說，今日每一個中學生，應把課外讀物特別重視，在學校課程表以外，有你自己的自學的一個課程表。至少的限度，每天你應看兩種日報，如申報，大公報，時事新報，立報，每月應看四種刊物，如世界知識，讀書生活，大眾生活，中學生，時事類編（選讀），婦女生活，生活知識，生存綫知識，新中華（選讀），經常要攜一本正確的社會科學，在你的代數學旁邊；至少每一個初中畢業生要讀完以下的幾種書：一本社會科學概論，一本社會進化史，一本社會問題大綱，一本社會運動史，一兩本各國革命史，一兩本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書；高中畢業生除開已讀完初中學生應該讀的各書外，要讀一兩本政治經濟學，一兩本新哲學，一兩本政治學及幾本實際研究中國問題，世界問題的書。這是起碼的限度，不問你畢業後經商，從軍，教書，唱戲，你都非如此

不可。這還是就書本說。自然，這還不夠，你們還應注意現實的每一事變，並參加社會的多種運動方面去。

中學生諸君，意阿戰爭已迫眉前了。這一戰爭你想它會引出怎樣的悲劇來？你們不要以為東菲隔我們中國遠，不會波及你，我恐怕這一戰爭爆發不久，我們就沒有平安日子讀「教本」了。趕快丟開那「銀盾」的夢罷！你們應大家起來，誠懇的要求學校減少不重要的功課，加添社會科學，至少應自己起來，在一種讀書班的形式下，糾集你們的同學去謀自己的知識上的補救罷！再不能遲延了。

有人說，「課本讀得最好的人，也許就是最無出息的人」，朋友們，這話不是全無理由的。我希望劉君及許多在苦悶中的朋友，暫時實行上面所列舉的三種態度罷！至於以後還有更具體的問題，我們決定不再忽視，希望常常能給大家一點幫助。